

從「勞動權益」到「新聞專業」： 自立事件的起源、過程與遺緒*

涂峻清**

投稿日期：2022 年 9 月 5 日；通過日期：2023 年 6 月 16 日。

* 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與編委會諸多寶貴的意見，使本文更加完善。本文改寫作者的學士論文，感謝陳翠蓮教授的指導與支持，林麗雲教授、何榮幸教授在口試中的指正，以及高于鈺曾一起討論與分析這些史料，還有本文寫作與修改過程中提供建議的陳偉智教授、莊勝全教授、林鶴玲教授、郭佩宜教授、李梅君教授，和提供報社與工會內部資料的涂建豐先生與彭琳淞先生。本文曾獲頒第十屆鄭南榕研究論文徵選之評審特別獎，感謝主辦單位鄭南榕基金會對於民主人權與言論自由相關研究的支持。《新聞學研究》第 52 期（1996 年 1 月出版）曾刊載內部新聞自由專題以及自立事件相關紀錄，自立事件能在百期之後再次出版於本刊，是令人榮幸的歷史巧合。最後，謹以本文獻給所有自立事件的參與者，謝謝你們的創造性與行動力為臺灣的媒體改革打開了許多可能，也讓我希望能寫下這段歷史。

** 涂峻清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研究興趣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經濟社會學與社會運動。e-mail: chunchingtu.tw@gmail.com。

本文引述格式：

涂峻清（2023）。〈從「勞動權益」到「新聞專業」：自立事件的起源、過程與遺緒〉，《新聞學研究》，157: 163-227。DOI: 10.30386/MCR.202310.0020

《摘要》

解嚴前後媒體環境遭逢巨變，新聞管制鬆綁隨之而來的是資本進場，戰後重要的自由與本土派媒體自立報系衝擊下面臨易主，引發一系列後續事件。本文探索 1994 年「自立事件」的起源、過程轉折、遺緒與當代意義。自立事件反映當時媒體累積的困境，再加上報社買主的因素，焦點從最初的「勞資爭議」逐步轉向具有公共性的「新聞自主」議題，結合社會脈絡成功引發關注，最後超越搶救單一報社，形成跨媒體行動，上街遊行並推動編輯部公約與催生新聞專業組織，留下組織、制度與象徵等面向的遺緒。過往的研究常將媒體變遷視為政治經濟結構轉型的產物，本研究探討一場媒體變遷引發的集體行動，看見媒體的自主與能動性，並拆解「媒體作為一個整體」的看法，分析其內在過程，指出媒體場域中不同行動者從報業經營者、編輯記者到工會都積極行動回應社會，並在勞動權益與新聞專業之間，承繼工會運動的脈絡，組裝來源複雜的新聞自主概念，經由特定論述過程與理念中介，最後從單一媒體的內部爭議，邁向媒體環境與新聞體制的整體改革，顯示自立事件在戰後新聞史中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工會、自立事件、社會運動、媒體改革、新聞史、新聞專業

壹、前言

1994年9月1日記者節，臺灣第一次新聞從業人員集結，加上聲援團體數百人在颱風天上街遊行，抗議唯一標榜「無黨無派」的自立報系面臨易主，由台南幫賣給三重幫陳政忠。「搶救自立」外也訴求「落實內部新聞自由、推動編輯部公約¹、催生新聞專業組織」。自立事件為解嚴後的新聞環境帶來深遠影響，遊行主要訴求「新聞專業」，然而運動導火線是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權益」，兩條軸線共同構成事件發展，也是後來新聞環境與媒體運動的核心議題。

本文從此出發，討論自立事件的起源、時代背景、演化過程、最後結果與遺緒，並回應其當代意義。解嚴後媒體管制鬆綁，然而國家退場、資本進場後許多規模較小的媒體出現困難甚至面臨倒閉，重要自由派陣地自立晚報曾有的榮景也逐漸衰退。另一方面解嚴前後蓬勃的工運，加上許多新成立的自主工會帶動自立工會的發展使集體行動出現基礎。自立事件起於媒體內的經營權轉讓爭議，背後反應的卻是整體媒體環境面臨的困境，在內部與外部運動過程中，邁向超出原本預期的臺灣社會媒體改革。重探自立事件具有知識與現實的重要性，時值解嚴前後媒體轉型的關鍵時刻，解除報禁後資本大幅介入媒體市場，且至今持續加劇，晚近媒體壟斷甚至境外資本的危機已經無法迴避；當時也是既有的媒體專業受到挑戰與反省，進而重新建構「新聞專業」和倫理的時間點，這樣的問題延續至今，還要再加上數位與社群媒介的衝擊，當前紙

¹ 「編輯室公約」與「編輯部公約」在自立事件意義相同，運動中隨不同時間點與使用者習慣交互出現，例如自立內部爭議初期「簽署編輯室公約」訴求，或記協「推動編輯部公約運動」。本文行文以當事人當下所採的用語為主。

本媒體面臨嚴酷挑戰。媒體專業自主以及勞動權益是現今媒體產業重要爭議面向，且仍未大幅溢出解嚴前後秩序轉變期的框架，而只有賦予媒體變遷完整的歷史脈絡，才能適切的理解其後的遺緒。

本文探討自立報系從虧損到易主的危機如何爆發？抵抗經營權轉移的行動如何誕生？傳播媒介場域的自主性何在，如何回應政治經濟衝擊進行行動？報紙同時作為運動目標與工具，行動者如何宣傳動員，事件又如何轉向公共，邁向跨媒體的改革倡議並催生新聞專業組織？最後，自立事件留下什麼遺緒？過往新聞史的分析時常著重於政治力或經濟力對媒體的介入，新聞史作為政治史或產業史映射，缺乏分析媒體的自主性，且時常視媒體為一個整體（黃順星，2010）。目前有少數媒體改革與民主化的研究中觸及自立事件，呂東熹（2010）詳細分析黨國體制下自立晚報創立以來的歷史過程以及其中政商關係的變化，從黨國體制到報禁解除，自立事件是 1990 年代自立報系在政商角力下的重要轉折點；管嫫媛（2008）從《自立晚報》社運線記者的生命史探討他們進入新聞業後專業精神的形成，如何在採訪過程實踐理念，以及這些記者如何看待自立事件的意義和當時的行動；蔡士敏（2008a）深度描繪自立事件核心參與記者的職業生涯，分析不同類型記者進入自立的過程與工作經驗，自立的環境強化了信念，他們的社會關懷與行動力在跑新聞的過程累積，最終在報社經營權轉移時投入抗爭，也影響了記者們的後續職業生涯。

這些研究標示了在產業變遷過程中自立事件代表的衝突，或是記者參與事件的經驗和後續生涯發展，然而自立事件本身尚未被視作研究主體探討。描繪自立事件發展階段的其轉折過程，才能理解其社會基礎，且自立事件不是孤立的歷史事件，有必要探討什麼樣的遺緒被留下並持續影響後來的媒體環境。本文標示自立事件在戰後臺灣新聞史的關鍵位

置，反應媒體環境、社會運動與行動者的關係，引發後續事件並留下影響。透過分析自立事件，本文探討媒體的自主性與行動能力，作為「受力者」被政治經濟力量影響，也是「施力者」對政治社會「具有自主性」的回應，兩者交互產生作用，而不只是單向受影響與回應衝擊，且媒體不是一個同質整體，而是一個「場域」，須看見其中異質行動者的互動、協力或衝突才能理解最後造成的效應。

本文將自立事件放在新聞史、媒體政治經濟學與社會運動研究脈絡中理解。媒體與社會運動或資本的拉扯是長久的重要課題，新聞專業與控制還有勞動待遇的爭議在日治時期《臺灣民報》的經營中就曾浮現（莊勝全，2021），顯示自立事件在臺灣新聞史中的位置，體現勞動待遇、新聞自主與資本控制的根本課題。戰後長期威權統治，政府管控各種基本權與自由，媒體領域亦然，長期報禁包含「限證」、「限張」、「限印」等制度導致媒體無法自由發展（楊秀菁，2002）。「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的分析指出國家壓制政治異議，由黨政軍經營與控制並只允許不挑戰當局的私人媒體，再加上新聞檢查搭配特定優惠等軟性控制，讓國家得以壟斷媒體環境（呂東熹，2010，頁 41-149；陳國祥、祝萍，1987）。「侍從報業說」則主張威權時期報業與統治者「保護主與侍從」的關係，前者提供意識形態傳播，後者供給生存資源，兩者關係隨統治正當性動態變化（林麗雲，2000）。然而這兩種觀點對媒體如何主動回應社會環境甚至推動變遷著墨有限。

媒體與社會的關係影響改革歷程，臺灣媒體發展和民主化及民族主義相互連結。現代化理論認為媒體自由程度與政治發展相關，媒體自由促進民主化，而民主化保障媒體自由，「媒體改革」作為一套發展計畫有規範性的歷程（如 Martin-Rozumilowicz, 2002，以政治開放與媒體管制程度分期）。然而看似線性的過程其實內部有許多衝突、合作、妥協

而變得曲折分歧影響媒體改革的路徑。²媒體也與民族主義和認同密切相關，從印刷資本主義到聲的資本主義，媒體與傳播科技促成大量資訊生產傳播以及社群的共同體意識（Anderson, 1991；吉見俊哉，1995／李尚霖譯，2013），臺灣的媒體從日治到戰後都與認同建構相互影響（Hsu, 2014）。本文要討論媒體與社會的第三種關係：媒體變遷帶動的社會運動，對公民社會的影響，及其中媒體展現的自主性。媒體是民主化的工具，同時媒體的民主化也是目的，兩者交互作用。以促進或阻止媒體變遷為目標的行動，深刻改變公民社會的樣貌，自立事件就是這樣的故事，「捍衛媒體」的價值促使人們集體行動，進而彰顯媒體的價值，形成追求媒體專業的力量。

然而所謂「新聞自由」並非普世與先驗存在，必須放在特定時空脈絡分析其建構過程，如何擴散到不同社會被實踐。中產階級與王室爭權，以及殖民地抗爭的歷史背景下，新聞自由概念自十七世紀歐洲發展後傳遞到北美並建立「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因應商業化和壟斷（Briggs & Burke, 2010; Ember, Emery & Roberts, 1997; Schudson, 1981），二十世紀再隨赴美留學返國者傳入中國，但實踐過程中遇到許多衝突，例如內戰局勢、愛國主義與黨政壓力等（樂羽嘉，2012）；新聞自由概念雖在戒嚴時期就傳入臺灣，但新聞界與傳播學界大多消極以對，反而強調「新聞對國家民族的社會責任」，犧牲「新聞自由」並為國家服務，直到解嚴前後才開始反省改變（楊秀菁，2012, 2014）。

這些歷程說明新聞專業自主並非給定的規範，而是經過特定建構與傳遞的實踐過程，媒體和國家統治、私人資本與公民社會三個範疇的關

² 例如 Freedman & Obar (2016) 提出媒體改革的三個方向，包括理解媒體（know the media）、另尋出路成立自己的媒體（be the media）與改革媒體（change the media）。

係並沒有特定的線性發展順序。例如拉丁美洲，媒體在外國勢力、國內軍權與社會主義力量交互影響下，受私人資本主宰缺乏平等參與，國家介入推動公共化導致獨立性的爭議，民間興起許多草根媒體（馮建三，2014；Fox, 1988）。而東歐媒體在 1980 年代末期民主化浪潮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媒體轉型並不完整，在民主化與市場化後仍缺乏「專業主義」（Gross, 2002）。拉美與東歐相異條件下呈現不同挑戰，韓國同為東亞威權轉型國家也面臨困難，1980 至 2000 年代報業改革雖放鬆管制，但無法打破家族財閥掌控的媒體集團，親官方的大報繼續結合保守派擴張（林麗雲，2008b）。與外國比較，自立事件突顯臺灣媒體改革軌跡，昭示解嚴前後國家控制、產業環境與公民社會力量的互動。解嚴初期勃發的社會運動奠定許多改革基礎，媒體傳遞資訊但也面對管制鬆綁後資本介入的危機，自立事件在此時爆發，訴諸公民社會並邁向新聞專業與公共利益的訴求。

自立事件是一系列組織化的行動。社會運動研究關切集體行動的條件，運動的發展及其後果。運動得以可能，需要政治體制變遷與足夠資源，極度封閉或開放的「政治機會結構」都難以出現抗議（Eisinger, 1973），而資源動員論強調社會不滿很多，但足夠的資源支持才能引發運動（Tilly, 1988）。自立報系內部爭議在特定政治機會下轉化為集體行動，其資源與社會脈絡相關。巨觀條件外也牽涉文化意義，「構框」（framing）是運動建構與凝聚意義的過程，「不滿」被詮釋後才能發揮影響，敘事的效果隨情境變化（Snow, Rochford Jr., Worden & Benford, 1986; Williams, 1995）。事件能由勞資爭議轉化成公共議題並定位「新聞專業主義」，就是特定條件下運用文化資源詮釋的結果。

本文在分析自立事件的「新聞專業自主」論述時，援引「組裝」（assemblage）論的角度來進行討論。受後結構主義興起的影響，1980

年代後組裝的概念逐漸興起，在諸如哲學、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皆有所發展，也因而產生多種多樣的架構。Deleuze & Guattari (1988) 提出組裝的概念，主張視社會本體為多重複雜與流動的各部份組裝而成，而非穩定與既存的。Latour (2007) 提出「行動者網絡」(Actor-Network-Theory, ANT)，強調對稱性的分析人與非人等各種行動者所形成的網絡式拼裝，並且看見物的自主性，能夠經過轉譯影響相關社會團體利益與興趣 (interest)。組裝理論在不同的學科中，包括經濟學、形上學與語言學等，挑戰既有的預設並提出許多新的思考方向 (DeLanda, 2016)。組裝論也挑戰了社會運動研究對歷史的看法，運動中的論述與行動未必內部穩定連貫與來源一致，並循著線性的歷史軌跡發展，也非來自歷史行動者的整體性規劃，許多後見之明「合理」的歷史發展，可能是從不同複雜脈絡流動而來的堪用資源偶然匯聚，多重開放來源的持續生成與變動，這些異質元素再因應所處社會脈絡被「組裝」成特定的樣貌 (李梅君, 2022; 洪廣冀, 2018)。本文在以上基礎進一步探索自立事件運動論述與意義建構的「組裝」過程，以及制度、組織與象徵的遺緒，還有對參與運動者的影響。

社會運動的後果包含改變社會制度、形成組織與影響參與者。運動的起源與擴散間，政治資源、文化意義和行動劇碼互相流動 (McAdam, 1995)，自立事件催生新聞專業組織也影響後續媒體改革。在行動者層次，運動改變許多參與者人生，美國「自由之夏」研究發現，從家庭生活、工作，到後續參與社運與否都有深刻影響 (McAdam, 1988 / 黃克先譯, 2011)，記者在新聞場域中的意識隨時間改變，解嚴前後記者透過新聞工作實踐新的價值與認同 (黃順星, 2008)。

本文透過當時報紙的報導、工會通訊、運動內部資料與運動參與者留下的紀錄等史料進行分析，並輔以訪談事件參與者。首先是報紙，自

立事件在當時新聞界引起迴響，各報多有報導，但許多報社對他報抗爭有所忌憚，因此仍以自立報系本身報導最為詳實，也帶有「報導紀實」與「運動宣傳」雙重意義，透過報導可以分析自立事件的進程與各界透過媒介所理解的再現事實。其次是工會通訊，自立工會發行《自立工訊》、《台北自立報報》、《台北自立快報》、《台北自立周報》等多種內部通訊，提供共識凝聚和論述建構還有組織動員過程的內部視角，呈現許多「沒有見報」的細節和參與者的思考。

再者是工會與其他組織內部的檔案、資料與記錄，展現組織與運動者如何動員與理解運動，並留下許多「沒有付諸行動」的計畫與思考，彰顯運動內部的多元異質性。還有事件關係人的回憶或口述，提供重新建構事件歷程與意義的多種角度，透過「當事人觀點」詮釋事件，例如報業經營者與新聞工作者，包含管理階層、編輯與記者。本文史料的重要特性在於，這場媒體運動中的行動者從記者、編輯到學者都高度擅長文字與論述，留下大量紀錄、詮釋與辯論。也正因如此需要注意書寫來源的不平均分布，可能使特定詮釋框架受到不成比例的再現，在分析過程中需要仔細區分事實陳述與當事人的詮釋，自立事件中兩者的交疊與相互生成更加明顯。最後是訪談，本研究在分析文獻檔案後，訪談事件參與者，希望能交叉比對事件發展歷程的詮釋，以及運動中的行動策略與反思，與文獻資料相互參照。本研究共深度訪談兩位當時任職於自立報系，參與工會與搶救自立抗爭的事件核心參與者（於後文標示為受訪者 1 與受訪者 2），主要詢問受訪者對事件不同階段發展的看法，以及運動者對於當時行動的自我詮釋。

表 1：自立報系工會相關通訊沿革

刊物	出刊頻率	發行期間	期數
《自立工訊》	每月出刊	約 1992-1994.6.8	21
《台北自立報報》	每周一至周六出刊	1994.7.4-1994.8.2	26
《台北自立快報》	每周一至周六出刊	1994.8.3-1994.10.12	58
《台北自立週報》	每周出刊	1994.10.19-1995.2.14	15

註：自立工訊確切創始日期目前難以查證，但可知 1993 年 5 月 25 日《自立工訊》改版並出刊第 8 期後，大約維持每月出刊的頻率。

工會於 1994 年 8 月請求吳豐山出面協調延後股份交割時間到會員大會後，吳提出《台北自立報報》停刊為條件，因此報報停刊改發行《台北自立快報》。

資料來源：〈創刊辭〉，1994 年 8 月 3 日，《台北自立快報》1，1 版。

本文首先提出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回顧相關研究、說明研究資料與方法，接著依時序分析事件發展。第二節討論事件背景，自立事件在勞資爭議框架下爆發與初期動員，並指出工會運動與勞動權益在其中的意涵。第三節分析事件「外部化」後的發展，學者、社運團體還有其他媒體工作者開始參與，推動編輯室公約以及運用報紙作為抗爭工具，並分析「新聞專業」論述的組裝過程。第四節討論「搶救自立」如何邁向跨媒體行動、推動編輯部公約以及成立新聞專業組織，與「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誕生及成立過程中浮現的專業主義與工會路線。本文最後標示自立事件留下的制度、組織與象徵的遺緒與影響及其意義。

貳、從自由派陣地到賠錢貨：1994 年易主前後的自立報系

一、黨國體制下《自立晚報》的演變

黨國體制下黨政軍營報社及侍從民營報紙佔據優勢，1947 年創刊的《自立晚報》是戰後臺灣第一家晚報，由曾辦報的中國籍報人顧培根創立，然而陸續遇到財務困難與因言論停刊而數度易手。1958 年政府欲修改《出版法》允許行政機關不經司法審判對報刊罰鍰與撤銷登記，《自立晚報》以頭版標題「新聞自由不容摧殘」和社論「歷史將制裁你們！」譴責（自立晚報報史編纂小組，1987，頁 35-43）。社長兼發行人李玉階 5 月 2 日於頭版刊登啟事強調他自五四運動入黨，後來自立受打壓，他退出國民黨從此無黨無派，5 月 3 日起報紙刊頭加上「無黨無派、獨立經營」成為自立的鮮明標誌（呂東熹，2010，頁 315-328）。報社自此雖確立獨立自主風格，但財務仍未起色，1959 年李與吳三連達成合作，在國民黨壓力下再加入新竹地方派系許金德形成三方共同經營，³ 協議書第一條寫下「公正超然於黨派之外」。地方派系與財團力量進入自立，外省人創辦的報紙開始由本外省人共治，是少數由有中國辦報經驗者在臺辦報並轉向批判政府的媒體（邱家宜，2020）。

1965 年又發生言論爭議，李玉階被迫賣出全部持股形成吳三連加上

³ 戒嚴時期統治集團透過公私營企業董監事跨坐網絡來攏絡本地社會不同勢力，分配利益以穩定控制，吳三連以及出身新竹地方派系的許金德都還曾擔任其他公營與私營企業的董事，見李宗榮（2009）。

臺南紡織代表的「台南幫」⁴ 和許金德的黨籍勢力三方共治到吳三連過世。自立事件關鍵人物之一吳豐山 1968 年進入自立，後續擔任採訪主任到社長，而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自立的人才以及報導言論逐漸邁向本土化（呂東熹，2020），訂戶也持續成長。報社在 1987 年大幅增資，並於 1988 年報禁解除時創辦早報，但隔年就因各報惡性競爭開始虧損。1988 年、1990 年吳三連與許金德相繼過世，公司改組，台南幫由高清愿主導，吳豐山擔任社長、吳三連之子吳樹民擔任發行人，形成自立事件前的格局（呂東熹，2010，頁 351-459）。戒嚴時期自立被認為相對「客觀、本土」的報導黨外與社會事件，成為黨國控制的大報外民眾獲知時事的重要來源，從 1960 年代雷震案與彭明敏案，1977 年中壢事件與 1980 年代林宅血案、陳文成事件、王迎先案都有報導評論（自立晚報，1994.8.14: 3）；還有 1982 年國策顧問陶百川被警總圍剿時聲援，到美麗島大審過程、1980 年代黨外選舉與民進黨建黨（吳圳義，1996b），還有 1986 年桃園機場事件獨家報導「軍警施暴」與雙方衝突的過程（彭琳淞編，2021，頁 44-46），自立都提供當時最完整的資訊，甚至副刊主編向陽還曾因專欄文章被警總與調查局約談（同上引，頁 67-69），足見自立報導與言論的風格。

二、報禁解除後自由市場衝擊下的自立報系

戒嚴時期《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寡占市場，政府 1988 年解除報禁採取「完全解禁」放任競爭但未積極「重建秩序」促進多元性與產

⁴ 「台南幫」是日治時期起於臺南北門的本土商幫，有複雜網絡與社會影響，也與國內外政經情勢與技術變遷相互牽連，台南幫的經營狀況及政商關係是理解其經營自立晚報之政策的重要線索，見謝國興（1999）。

業民主，兩大報從售價、版面到派報都投入資本競爭，更減低市場多元性，中小型報紙大都經營困難，只有《自由時報》師法兩大報投入大量資本拓展業務而能三分市場，三大報最後都缺乏公共性，控制與服從關係隱蔽化，但政商力量仍與報業糾纏不清（林麗雲，2008a），1990年中時、聯合及其旗下《民生報》三者共占有超過七成市占率，而《自立早報》與《自立晚報》分別只占有百分之 3.6 與 2（賴光臨，1991）。自立從吳三連 1965 年接手到 1987 年都在虧損，當時晚報發行量約三萬份，吳豐山接任社長後大幅增加發行量與零售點，但仍無法轉虧為盈，直到 1987 年 8 月報業公會將每份報紙售價從 5 元提升至 8 元，當時發行量已達十三萬份的晚報開始每月淨賺五百萬元。好景不常，自立董事會在 1987 年底決議創辦《自立早報》以擴大市占率，但同時聯合與中時也決定創立晚報加入競爭，且不計成本不限張數「流血競爭」（彭琳淞編，2021，頁 67-69），在此衝擊下最終早報並未創造收益，晚報也在競爭下逐漸失去優勢，自立報系 1988 年又開始虧損（吳豐山，2015，頁 36）。

為了因應外在條件變化，1990 年初報社首次停發年終並在當年底裁員 97 人，1991 年底早報改版並再裁員近兩百人，衝突隨即爆發，工會召開說明會拒絕接受裁員並要求社方以退休給付比照資遣，此時的訴求以維護員工權益為主。隔年改版與裁員減張下虧損降低，但也開始改組，台南幫放棄增資，1993 年初吳豐山胞兄吳和田購買台南幫部分持股並出任董事長。吳豐山後來回憶，早報擴張太快導致虧損無法控制，但「工會抗爭過頭，員工無權決定報紙要賣給誰」（江碩涵，2008），且編採自主訴求基本上雖無違誤但「言行輕狂失之過當」，站在協助新資方接手的角度，工會行動造成很大困擾（吳豐山，2015，頁 38-44）。1994 年初再傳出赤字擴大，工會要求公司說明與給出承諾（自立工訊，

1994.1.28: 1)。各種報社易主傳聞開始流傳，5 月高清愿表示有意繼續投資，6 月台南幫又決定賣股權給三重幫陳政忠，國民黨籍臺北市議員作為執政黨成員，加上所屬建商財團三重幫，還被控涉入掏空公司資產與操縱股價等案件，其形象「與自立迥異」，許多員工擔心報紙成為其政治宣傳工具，使編輯方針與獨立自主受到干涉（彭琳淞編，2021，頁 203、288），⁵ 原訂 7 月 1 日交割股票，引起反彈後暫緩交接（涂建豐，1996a），「自立事件」從此展開序幕。

三、勞資爭議與衝突的高峰

自立工會很早開始因應變局，4 月 26 日工會舉行早報同仁權益座談會，向會員報告買主消息與報社財務，公司前景不明、員工保障模糊，5 月 9 日工會完成「在太陽從東邊升起之前——自立報系體檢意見書」，訴求社務改革（自立工訊，1994.5.11:1），5 月 26 日員工鬥陣大會決議要求報社永續經營延續既有報風並「尊重新聞專業自主」，未來變動應尊重員工意願且不得降低勞動條件。6 月 14 日高清愿向工會表示報社陷入困境，增資後無起色難對股東交代，且上次資遣時被舉布條抗議「讓別人覺得很可怕」造成沒人敢接手，因此一定要改革，高提出連同發行人共七百多人全部資遣結算年資後重新擇聘。吳豐山要工會「看遠一點，一時的小虧要忍耐，過去股東賠得太多了，別報都不曾舉白布條」（〈1994 年 6 月 14 日高清愿先生談話錄〉，1994 年 6 月 17 日）。

⁵ 感謝審查人指出，1992 年立委大選，當時社長吳豐山交代向陽找幾位擅長文宣的同事成立工作室，遊說立委候選人委託文宣業務以開闢報社財源，而當時委託的候選人多為民進黨籍（彭琳淞編，2021，頁 74）。這樣的工作是主動招攬，並不同於整間報社的經營者易主為國民黨籍政治人物，因此並未引發太多關於新聞專業自主的爭論，進而影響運動。

比起 1990 與 1991 年兩次資遣，經營者嘗試調整員額減少虧損，1994 年高清愿已不願再支撐，只想賣掉報社。前兩次工會行動為 1994 年抗爭提供「預演」機會，工會操兵展現實力，公司也對工會可能採取的行動獲得部分認知。再加上工會許多成員有抗爭經驗，例如幹部王幼玲參與工運、彭琳淞有學運經驗，早報記者蔡慧琳曾在任職民眾日報時參與抗議薪資結構的行動等（蔡士敏，2008a，頁 40-41；蔡慧琳，1994 年 9 月 17 日），使抗爭在具備基礎下展開。然而前兩次裁員影響局部員工尚屬「利益分配」問題，1994 年易主牽涉整體經營與制度變化，衝擊程度上升到「存亡威脅」，導致工會的動員與引起的迴響超乎以往，使接下來的抗爭往「社會公益」層次邁進。工會進入高度動員，5 月 26 日員工鬥陣大會後發送「局勢分析」文件具體思考，包括新買主分析，比較高清愿與吳豐山人事方案與工會法律地位危機（〈局勢分析〉，1994 年 6 月 17 日）。6 月 14 日工會以「工作權存亡關頭」召開大會說明員工權益可能變化並擴大工會決策小組（自立快報，1994.6.14: 1），工會通訊《自立工訊》在 6 月 8 日發出第二十一期後停刊，轉型為《台北自立報報》快速傳遞事件動態。⁶

四、自立事件中的勞動權益與工會運動

自立報系易主能引起後續事件，源於自立工會關注員工權益，加上前幾次裁員時組織行動留下的遺緒。臺灣戰後的勞工抵抗很早就出現，但起初未外顯與組織化串連，而是分散在各地工廠中勞動者與小資方的

⁶ 工會內部刊物如何翻轉權力關係批判與嘲諷資方同時動員組織的行動與認同，雖非本研究重點，但為有趣的媒介再現課題，有媒體工作者在事件後期投書媒體分析，見鄭聲（1994 年 9 月 26 日）。

動態互動中 (Liu, 2015)。追溯工運發展，國營事業一直都存在工會，但不是「工運意義」的工會而是黨國侍從。1980 年代政治結構鬆動，1988 年出現首波罷工風潮，工運抗爭風起雲湧 (何明修, 2016)。為對抗資方掌握的「閹雞工會」，基層勞工開始成立「自主工會」，新聞界也參與其中，聯合報產業工會率先於 1988 年 3 月成立，至 1994 年有十四家成立，大多媒體工會由基層印務部門勞工主導，編輯記者投入比例較低，電子媒體則有較多行政與製作部門參與，但新聞部門仍大致與工會保持距離 (袁孔琪, 1996 年 11 月 19 日)。自立報系產業工會 1988 年 9 月也在這波「自主工會」風潮中誕生，相較同年 5 月中國時報工會成立三名記者遭開除的衝突，自立工會並未受嚴重打壓，僅被公司「表達關注」。工會成立的關鍵人物王幼玲主跑勞工新聞，長期關注工運，認為「報社沒有工會很奇怪」開始組織工會。不同於其他報社，自立工會由記者與編輯主導，具強烈運動性格，也發行工會通訊，甚至吸引關心勞動議題的記者應徵自立以進一步加入工會 (蔡士敏, 2008a, 頁 57-59)，成為集結員工力量的重要基礎。

然而這並非展現臺灣發達的左翼力量。反之，左翼傳統雖一直存在，但自日治到戰後始終處於邊陲伏流，未曾成為大眾認同的主流 (陳翠蓮, 2009)，且戰後在反共氛圍下「勞動」具有禁忌色彩難以被明顯標舉，這也說明為何雖然工會運動與勞動權益在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未成為運動面對社會的主要訴求，也未往「媒體公共化」、「員工經營」等方向演化，後來反而以新聞專業、民眾「知的權利」為主。過往對於媒體工會沒有太多研究，然而包含記者勞動過程與勞動條件，到工會組織與團結可能性等議題都牽涉其中，因此分析媒體工會相當重要 (馮建三, 1998)。媒體與記者工會的組織形態具特殊性，比起其他「工廠工人」，記者有大量文化資本與敘事資源，容易打造共同意識並

凝聚團結，且「傳播」作為專業，在理解事件並發展行動具有優勢。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自立事件中領導核心都是記者，但工會仍有注意到報社中非記者的成員，並將他們納入權益爭取的範圍，例如工會送咖啡的行動除早晚報編輯部、出版部這些文字部門，其他像電檢組、製版組、校對組、美術中心、印刷廠、社服部、管理部、業務部門、聯誼中心、收費管理員，還有總社外的新營廠、五股廠、臺中管理處、臺南辦事處、高雄辦事處，都包含在活動對象（台北自立報報，1994.7.6: 1）。

在這個階段，自立工會與員工行動以保障勞動權益為主，工會動員會員關心「切身相關的權益」，精算退休與資遣費用，要求資方負起責任。自立的「內部運動」發軔，並創造他們的「內部新聞」，也就是每天傳遞與詮釋意義的最新資訊並據此動員。在這之間「內部新聞自由」與「新聞專業自主」概念開始浮現，即將在下個階段發揮比勞動權益更大的運動影響力。1994年上半年，時常伴隨「全員退休擇聘」出現的是「維護報導獨立自主」這類呼聲，顯示除了勞動權益，記者們也留意到新聞專業可能遭到改變，進而影響自立報系立場，因此「新聞專業自主」理念開始在勞動權益呼聲中成長，不過此時較屬於立場宣示與理念標榜的性質，如何維持新聞專業獨立自主的具體手段還未出現。事件下一階段將從此開啟——「外部運動」以及「外部新聞」的出現。自立事件起於維護勞動權益，但新聞專業的浮現，才使運動外部化受社會各界關注。因為自立的經營不只關乎員工權益，更關係到社會大眾的閱聽，因此「搶救自立」引起社會共鳴成為下一個階段的主軸，並且將「新聞專業獨立自主」的宣示性理念型塑出具體訴求以爭取與實踐。

參、從勞資抗爭到搶救自立：轉向公共的媒體運動

一、搶救自立行動：學界與社團的介入

自立報系內部的勞資爭議，在確定經營權易主以及新資方後，逐漸成為公共議題，早報記者陳銘城申連同業、學界與社運團體（蔡士敏，2008b，頁 508-510），7 月 13 日中研院院士李鎮源、臺灣筆會會長李敏勇、政大新聞系副教授馮建三與陳銘城等學者和媒體工作者共同聲明展開搶救自立，連署指出自立事件的公共意義（底線為本文所加）：

在台灣的特殊政經環境裡，媒體自主性一向欠缺。但在民主化發展歷程，媒體自主性又備受期待，欠缺與期待之間，自立報系的編採表現有其獨特的位置。

現在，因為經營權即將轉移，自立報系面臨媒體自主性是否能夠維持的疑慮；自立報系員工面臨惶恐的危機。

為珍惜自立報系員工已建立的成果；爭取媒體自主性在台灣社會確立其地位。我們呼籲：社會各界共同關切自立報系經營權移轉的情勢發展；關心自立報系員工為新聞事業及其權益所作的努力。

我們並希望新的經營者能夠尊重自立報系的編採風格，不要破壞媒體的自主性，讓自立報系員工對台灣的民主化發展作出更積極的貢獻（台北自立報報，1994.7.13: 1）。

這個聲明代表事件正式外部化成為大眾關切的議題，四段文字有三段強調媒體自主和自立應扮演的角色，一段同時強調媒體自主與員工權

益。隔天新社會基金會在立法院舉行「媒體·財團·政治——從自立報系改組談起」座談會，由立委彭百顯與國代許陽明主持，作家李敏勇、學者馮建三、李鴻禧及自立記者出席，與會者肯定自立報系四十多年的貢獻，關注股權轉移對編採風格的影響，並要求接棒者維持既有風格；自立工會推派決策小組發言人彭琳淞強調延續自立報風與保障員工權益（台北自立報報，1994.7.19: 1）。

「搶救自立」聲明迴響熱烈獲超過七百人連署，此時雙方對「廣告內容」展開鬥爭，原本訂下晚報 7 月 19 日兩個版面，但 18 日晚間廣告部總經理洪樹旺告知，社長或發行人反對自己報紙出現「搶救自立」，最終被迫改為「關切自立」並改刊完整連署名單與「搶救自立」聲明於《中時晚報》全版廣告（中時晚報，1994.7.19: 12；台北自立報報，1994.7.19: 1；自立晚報，1994.7.19: 2）。自立風波引起公眾關注，陳菊感嘆伴隨反對運動的自立竟因虧損易主，「由炒地皮起家、企業形象甚差的三重幫集團接手」（陳菊，1994 年 7 月 25 日）；傳播學者翁秀琪指出長年貢獻民主的新聞工作者將一起被賣掉，「理想終不敵鈔票」（翁秀琪，1994 年 7 月 27 日）；法律學者賀德芬批判解嚴後言論市場看似多元開放實則逐漸被財團壟斷，呼籲民間加強監督（賀德芬，1994 年 7 月 29 日）。

圖 1：「關切自立」聲明廣告



資料來源：〈「關切自立」聲明〉，1994 年 7 月 19 日，《自立晚報》，2 版。

各界呼聲自八月初在自立不同專欄刊登，社團發揮重要作用，例如「澄社論壇」與「女學會專欄」，可見事件引起自由派學者社群關注。這些評論共同呈現幾個想法：首先他們都重視媒體公共性與專業獨立，肯定自立長期關注不被主流媒體報導的議題；再者批評解嚴後財團介入媒體市場造成生態失衡，與買主三重幫形象不佳；他們大致提出兩個解方，一是訴諸公民社會，透過全民監督制衡政府退出管制後財團的擴張，另一則是以市場邏輯回應市場邏輯，疾呼台南幫不要拋棄自立，或「有良心的」本土金主能擔負責任扛起自立。他們進一步喊話「挽留台南幫」，8月6日賀德芬、李永熾、鄭欽仁、李魁賢等學界與文化界人士召開記者會批評台南幫在報社經營困難時脫手不符社會責任，他們宣布將拜訪台南幫大老「遊說他們不要一走了之」，否則也要協助其他企業接手以維護自立品質與促進媒體生態多樣性（自立晚報，1994.8.7: 3）。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工會的抗爭論述從關注勞動權益到開始強調媒體的公共性與自主性，透過聯繫學界、文化界、政治人物與民間社團的聲援，成功將事件重新框架為「媒體自主的危機」。

回到勞資爭議，湧動的「外部運動」與「外部新聞」並沒有掩蓋緊張的勞資關係，然而這部分「內部運動」只在「內部新聞」現身。七月工會與新舊資方持續拉鋸人員資遣聘用、報社經營策略、協商與觀察期限，原定8月3日交割，吳豐山同意致電陳政忠延至8月15日（台北自立報報，1994.8.2: 1）。8月11日工會召開臨時會員大會，以264比9的懸殊票數通過堅持全員退休擇聘案並授權工會談判（自立晚報，1994.8.12: 3）。隔天工會傳達決議給社長陳榮傑，陳表示據他了解「陳政忠不可能接受全員退休案」，且為履約一定會交割，雙方仍無交集，工會也強力表達要求暫緩交割（台北自立快報，1994.8.12: 1）。

二、「新聞自主」的具體化：推動編輯室公約到票選總編輯

新資方承諾「尊重編採自主性及維護客觀公正」後，自立編輯部提出「編輯室公約」訴求。8 月 4 日記者與編輯發起連署，回顧自立 1959 年改組時的「言論風格客觀超然於黨派之外」協議，要求陳政忠若成為新資方，新資方與編輯部應秉持以下原則簽署「編輯部公約」：

- 一、總編輯為編務最高負責人。
- 二、總編輯之任命應由記者與編輯投票產生或行使同意權。
- 三、董事會、發行人、社長不得以人事獎懲手段等任何理由干預編輯部新聞專業與自律空間。
- 四、總編輯應定期召集記者與編輯舉行新聞編採事務檢討會議（台北自立快報，1994.8.4: 1）。

編輯室公約此時與「全員退休案」成為兩個運動主軸，顯示勞權與專業的交會，都進入細節討論將抽象概念具現到實際制度，新資方從原則性同意到針對實際方案反對，使運動在交鋒過程中推進（自立晚報，1994.8.13: 1）。儘管如此仍未改變預定的股份交割，這段時間報社出現混亂，爆發肢體衝突、主管威脅發言員工、不准休假等事件，晚報以〈白色恐怖籠罩自立報系〉大標見報（台北自立快報，1994.8.13: 1；自立晚報，1994.8.14: 3）。

自立報系同時是運動目標與運動工具。8 月 13 日晚報除了頭版頭，還以第三版全版報導自立現況，包括報系歷史、員工訴求與各界聲援（自立晚報，1994.8.13: 3），隔天晚報頭版又以一幅「洞房花燭自立報系新娘遭硬上」漫畫抗議（自立晚報，1994.8.14: 1）。自立記者與編輯

們利用新聞版面，從員工主體角度呈現抗爭代表雙重意義。這系列報導揭露了難以見報的抗爭進展，另一方面也藉此行動實踐「具有獨立、本土精神」的精神，面對自主性的流失積極行動發聲，並站在社會公益的角度處理「涉己新聞」。

但這些行動沒能抵擋報社易主進入倒數。8月14日晚上決策小組號召員工攜家帶眷參加報社門口的「保衛自立之夜」，黃榮村、馮建三與張清溪等學者到場，還有工運團體勞陣、工委會聲援，現場由地下電臺綠色和平與寶島新聲轉播（自立早報，1994.8.15: 1）。⁷ 8月15日台南幫如期將78%股權轉移給宏福建設，成交金額三億多元（工商時報，1994.8.16: 4）。早上部分員工在報社門口靜坐抗議，下午工會發動前往台南幫三連大樓抗議，丟完五百顆雞蛋「蛋泥橫飛」。當日晚報頭版刊登魚夫的漫畫，以「忠」與「統一」共同閹割濺血象徵自立精神破壞殆盡（自立晚報，1994.8.15: 1）。交割當天新資方隨即宣布新人事，但記者編輯們難以接受，主管也辭職表態，自立報系副社長兼晚報總編輯李永得、早報總編輯借調澳洲自立快報社長胡元輝、早報總主筆林淇養、早報副總編輯代總編輯兼自立周報總編輯蘇正平、晚報副總編輯陳依玫、美術中心召集人何華仁皆發表聲明指員工與各界對新資方能否「維繫自立固有報格、尊重編採自主權」有所疑慮，且新資方對編輯室公約缺乏承諾因此辭職希望喚起新資方重視並簽訂公約（台北自立快報，1994.8.15: 1；自立早報，1994.8.16: 2）。

⁷ 事件中面對抗爭的「新聞」，傳統電視臺如當時三臺（中視、華視、台視）雖有前來採訪但都以「稿擠」為由沒有報導，反倒是寶島新聲、綠色和平等地下電臺與TVBS等有線電視臺較為關注，自立早報（1994.8.17: 2）報導此事，顯示抗爭者意識到傳播管道權力壟斷的難題。

圖3：股權交割當日的工會通訊



資料來源：〈哀痛〉，1994年8月15日，《台北自立快報》，1版。

從「勞動權益」到「新聞專業」：自立事件的起源、過程與遺緒

圖 4：股權交割當日自立晚報頭版的插畫



資料來源：〈自立精神〉，1994年8月15日，《自立晚報》，1版。

圖 5：股權交割隔日自立晚報頭版留白的頭版



資料來源：〈歷史會記住這一天〉，1994年8月16日，《自立晚報》，1版。

8 月 16 日報社易主第一天《自立晚報》頭版留白，寫下「歷史會記住這一天」並說明：

親愛的讀者：

本報編輯部同仁正與昨日入主的新資方協商「編輯室公約」，以確保「客觀、公正、本土」報格之延續。由於新資方尚在「研究」中，因此今日只出報三大張。對讀者造成之不便，特此表達深深的歉意。

自立晚報編輯部敬上（自立晚報，1994.8.16: 1）

新任晚報總編輯林森鴻與原總編輯李永得一起到編輯部交接，但現場遭到阻止，新發行人郭正昭現場強調「確認自立報格、留任全體員工」，但以「人事是董監事會決議」為由拒絕簽署公約（聯合晚報，1994.8.16: 2）。隨後晚報編輯部根據編輯室公約開始臺灣第一次「總編輯票選」，由編輯部投票，非編採同仁可以「友情參與」。在臺北、臺中與高雄連線投票下由現任總編輯李永得獲編採部門 88 票加上其他部門 71 票共 159 票勝過資方派任新總編輯林森鴻 0 票；稍後早報票選，原副總編輯蘇正平也獲編採部門 48 票加上其他部門 61 票共 109 票當選。儘管官方不承認，但李永得仍由編輯部「護衛」繼續以總編輯身分發稿（台北自立快報，1994.8.16: 1），自立員工再度在達成訴求前就用行動「預演」實踐。以報紙版面抗爭成功引起關注，當天報紙很快售完還引起外電報導，包含路透社分析自立報系重要性；法新社介紹留白的頭版與新資方的疑慮（自立早報，1994.8.17: 2），留白的頭版引發關注將運動傳播到海外，搶救自立運動再回頭繼續宣傳「自立事件引起國際關注」的敘事。

票選總編輯後資方仍未出面協商，於是 8 月 17 日社評被標示「抗

議中」與「多位主筆抗議新資方迄今未對編輯室公約有任何回應，拒寫社評，敬請讀者見諒」（自立晚報，1994.8.17: 3），至此已有頭版留白、社評留白、頭版新聞、廣告聲明等不同形式抗爭。隔天公司出面，但編輯自主、員工權益等問題仍未有進展（《台北自立快報》，1994年8月18日）。編輯室公約持續引起各界關注，鄭瑞城、徐佳士與翁秀琪等學者從新聞工作者權益、財團對媒體影響以及報紙作為社會公器等角度再次闡述公約的重要（自立早報，1994.8.17: 2），澄社、台教會與台權會等團體也表達支持，澄社社長黃榮村表示在新資方具體善意回應公約前社員將停止在自立撰寫專欄（自立晚報，1994.8.17: 2）；台教會也跟進停止會員的專欄（自立晚報，1994.8.19: 2）。

此時國內政治情勢，8月26日國民黨第十四屆二中全會，高清愿正競選中常委，工會多次「助選」舉行「宗教儀式」，從吳三連復生痛罵到朗讀祭文招魂，還公布「高清『怨』十大政見」，包含「統一中國反對自立」、「出賣自立報系封殺在野聲音」、「扶植鬮雞工會創造勞資不分場面」使高難堪，最後高以倒數第二名當選（台北自立快報，1994.8.24: 1）。同時年底將舉行首屆省長與北高市長選舉，在野黨政治人物以「關切自立事件」象徵支持民主、守護本土報業，如施明德、林義雄與陳定南等民進黨領袖與候選人以「人權、患難、自由」等道德化語言聲援並自我表彰，連新黨趙少康都前來表示關注（中國時報，1994.9.2: 14；台北自立快報，1994.8.16: 1；台北自立快報，1994.8.18: 1；自立晚報，1994.8.20: 2）。由此可見自立抗爭同時與政治情勢互動，受影響也作為場域中行動者得以運用的資源。自立同時作為「受力」與「施力」者，而「本土、自主」的象徵是自立得以成為文化資源的關鍵。

三、「新聞專業自主」論述的流動與組裝

抗爭的重要論述基礎「新聞專業與自主」來自兩個來源，一是自立早期改組的協議，另一是傳播學者引介的理論與案例，兩者淵源與內涵不同，經自立工會與其他抗爭者結合情境打造成新的論述。

首先 1959 年李玉階、吳三連與許金德在自立改組時簽訂協議，第一條為：

「本報言論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倡導自由民主法治之精神，並以公共客觀超然於黨派之外立場為最高原則。」這項原則經李玉階孤軍奮鬥八年，以體現為自立晚報基本旨趣與明確立場，而此次參加的新股東，均是民間人士，率皆認同無所更張，乃特明載於協議書中（呂東熹，2010，頁 328）。

放回 1959 年的政治脈絡，首句「國家民族利益」是當時普遍的修辭。公約連署書強調「言論風格以客觀超然於黨派之外為最高原則」的部分，但未對「國家民族利益」加以詮釋，以「自立向來客觀、本土」的敘事對比「即將失去獨立的精神」。三人中李玉階捍衛新聞自由立場堅定，1958 年抗議退黨；吳三連相對溫和推動政治理想，不直接挑戰權威；許金德則來自國民黨抗衡吳代表的台南幫，後來李退出，由台南幫與國民黨派系共治。李玉階是「新聞自主」的象徵，自立員工也學習他的抗爭劇碼，過去自立經營者透過報紙抗議政府修惡新聞法制，此時自立員工透過報紙對經營者抗爭公司易主與新聞自主的危機。

吳三連在回憶錄中提到接辦自立最重要的任務是堅持客觀公正辦報理念與促成報業現代化，期待後繼者貫徹使命，也認為多年報導評論對

國家社會有所貢獻（吳三連，1991，頁 166-169）。實際上戰後報業資本與人事一直由國民黨與外省籍掌握，到 1970 年代才開始本土化，自立的人事在 1970 年代，與言論部門在 1980 年代逐漸本土化，變遷過程是黨國體制與報社不同勢力鬥爭的結果，並非自始傾向本土（呂東熹，2020）。抗爭時吳三連被奉為精神領袖，其經營不斷被重述為「維護言論自由」、「堅守客觀、公正、本土」形象，以批判新資方使「三老精神」淪喪。

雖然自立的確是戒嚴時期首屈一指的自由報業，但不挑戰統治者、符應當局期望、反臺獨，以「諍友」前提發表異論卻更重「安定」，這樣的面貌在抗爭論述消失。例如雷震 1960 年組黨，社論認為成立新黨雖對國家有益但在野人士不應鼓動風潮，呼籲雙方互相容忍，或在蔣介石多次連任時表達支持並希望能「開闢合法途徑」（吳圳義，1996a），可見自立的客觀與本土是有限且妥協的。戒嚴時期自立的「本土、自由」與 1990 年代民主運動意義的「本土、自由」有程度與性質的根本差別，相對而言戒嚴時立場更鮮明的《公論報》早已不復存在。由此可見運動敘事呈現「策略性的本質主義」，「自立一直獨立自主」的敘事並不是描述歷史事實，而是象徵想像中的自立應呈現的理想與期待的未來發展。⁸

第二個來源是歐美「內部新聞自由」理論與外國案例。國家控制鬆綁「外部新聞自由」達成後，威權可能轉往媒體內，由報老闆享有自由但報紙生產過程「內部新聞不自由」。留德傳播學者翁秀琪 1987 年發

⁸ 「策略性本質主義 (Strategic Essentialism)」由 Spivak (1990) 提出，在後殖民批判的脈絡中常用於被殖民者擺脫與對抗前殖民者並追求認同的過程中，在本質主義的後果與破碎的共同體意識間尋求平衡的策略，臺灣案例相關討論見蕭阿勤 (2005)。

表〈傳播媒介內部的新聞自由——開放報禁後的另一個問題〉首開臺灣對內部新聞自由的討論，引介西德學者 Walter Mallmann 提出的「新聞室內部的自由」(Innere Pressefreiheit)，也介紹有編輯室公約與「編輯顧問委員會」的媒體，如德國「明星雜誌」(Stern) (翁秀琪，1987 年 4 月 7 日，1987 年 4 月 8 日)，另兩位傳播學者徐佳士、李金銓也曾撰文呼籲媒體老闆尊重記者自主權，並倡議成立記者工會保障專業自主 (李金銓，1987；徐佳士，1987)，法律學者林子儀則從憲法與基本權出發比較美國法制，區分言論自由為「個人基本權利」與新聞自由屬「制度性基本權利」，建構新聞自由內涵並提出法規建議 (林子儀，1993)。

學界外新聞界也積極尋找出路。記者蘇正平 1991 年由新聞評議會獎助出國考察，研習報告分析新聞作為社會公器與私有商品如何透過新聞自主取得平衡，還有蘇聯解體時東歐媒體受的衝擊和日本報社勞資關係；也指出新評會與國外新聞自律機構性質不同 (蘇正平，1993, 1996)。抗爭期間記者編輯透過報紙譯介國外經驗，如徐璐藉泰晤士報併購案例指出國外媒體商業化下記者編輯對新聞專業自主的努力成果 (徐璐，1994 年 8 月 29 日)；還有德國法學家 Georg Ress〈法國的新聞自由及報社企業的內部結構〉一文由林佳和摘譯、翁秀琪審定，介紹法國勞資關係並探討員工的「共同決定權」與維護記者權益的「良心保障條款」(Ress／林佳和摘譯，1994 年 9 月 21 日)。

同時，抗爭者以亞洲案例強調新聞自主不是歐美特有現象，香港與韓國都被放在搶救自立的脈絡敘述。香港記者協會 1968 年成立，定位為記者工會，維護工作權益同時希望提升專業，在香港主權轉移時也關注新聞自由變化 (賴秀如，1994 年 9 月 2 日)。又如韓國，1988 年《民族新聞報》由受朴正熙政權迫害的記者們向大眾募資，至今為韓國最有

影響力的進步派報紙。自立即將轉賣期間文化界人士提出「另辦新報」構想，認為參照韓國案例加上臺灣籌設地下電臺經驗「成立一份臺灣人報紙不是問題」，構想新報可以由員工主導，不受財團牽制全心為臺灣、為民主發聲（自立早報，1994.8.19: 2）。

事件中「新聞自主」概念的豐富意涵顯示文化資源的時空跨度以及「組裝」的內部複雜性，行動者在多元知識資源中試圖動員出一個具連貫性與號召力的論述，不只是搬移既有的「專業自主」論述，更創造出反應當下情境，也連結異質行動者的主張（Deleuze & Guattari, 1988）。運動者回顧改組時的協議和李玉階發聲的歷史，策略性本質主義的重寫對戒嚴時期報導與言論的評價，將之符應當下的情境，轉換參照的對象，詮釋過去的事件來投射想要保衛的現在與寄望的未來；同時在與學界建立連結的過程中，將源於德國的理論主張賦予在地意義，置放在自立事件中作為可能出路，經由援引歐美與東亞案例來指涉「臺灣也有條件」，最終延展時空的尺度超越單一事件意義，引向跨媒體行動。

四、「事件公共化」的論述過程演化

1994年7月以來自立易主與勞資爭議逐漸成為公共議題。從「搶救自立」連署，「新聞專業自主」開始與勞動權益並列事件的兩條軸線，到「編輯室公約」具體化為可操作的訴求，同時援引國外案例說明公約可行與重要性，也以報紙本身作為抗爭工具進行編採自主的「預示」。搶救自立的運動目標與工具高度重合且運動者熟悉使用媒介，在這樣條件下「專業自主」論述的出現使得透過報紙進行抗爭具正當性且有效。

運動的論述框架隨著外在環境的變化以及行動的進程變化，自立工會的參與者在訪談中，把外在條件、行動者，以及運動主張連結起來，

一開始自立經營狀況風雨飄搖，但買主還不明的情況下，工會支持「全員退休擇聘案」以維護勞工權益；接著在傳出新買主是陳政忠後，便由編採部門的記者結合學者與社團發動「搶救自立」，希望拒絕有疑慮的新資方，並且維護新聞的專業獨立。到確定無法阻擋，陳政忠入主成為事實時，推出編輯室公約的主張，成為工會第二個訴求，希望能建立制度性的保障，超越對個人的抵制；最後過程中曾參與的各報社記者，再組成跨媒體的專業組織。這個歷程中不同階段並不是互相取代，而是持續擴大關注，並且有不同的焦點，代表不同的參與者（受訪者 1）。

運動論述與關注焦點的變化反映參與者與社會影響範圍的改變。自立事件的公共化，從初始自立員工與工會，再到學者和社運團體關注，經過特定「論述過程」才得以達成，即結合當下社會條件加入有利的論述元素，再整合其他運動者關注但未必是初始焦點的論述，策略性本質主義的組裝出來源複雜得以容納不同利益關係人且具號召力的理念。自此運動將更高程度公共化，追求媒體環境改革。公約完成具體條文也影響其他報社勞資關係，倡議過程中生成「全國性新聞專業團體」的想像並開始推動，再到記者上街遊行，這些集體行動在自立內部抗爭遇到瓶頸時，帶著搶救自立的能量、文化資源推向追求媒體改革的下一階段。

肆、邁向結構改革：九〇一上街頭與催生新聞專業組織

一、跨媒體行動的浮現

一群跨媒體新聞工作者和學者在自立編輯室公約僵持時發起「推動編輯部公約運動」，提倡以公約平衡私利與專業，追求「整體媒體品質」（台北自立快報，1994.8.20: 1）。發起的「跨媒體小組」可以追溯

1993年幾位國會記者的聚會，包含《自由時報》何榮幸、《中時晚報》郭淑媛、《聯合晚報》楊汝椿、《財訊》陳玉華與《自立晚報》彭琳淞共同進行非正式媒體觀察，也討論籌組工會議題，希望從新聞工作者主體瞭解媒體環境，不過後來各自忙於採訪年底選舉而自然解散。這個網絡在1994年中發揮作用，七月「搶救自立」聲明後自立記者陳銘城、李瓊月、蘇正平、涂建豐及自立外的何榮幸、郭淑媛、楊汝椿、《民眾日報》張瑞欽、公視劉俊宏、《中時晚報》陳香蘭十人開始每周聚會，試圖組織與理論化內部新聞自由的倡議，後正名小組為「九〇一新聞自主推動小組」，簡稱九〇一小組，並規劃9月1日記者節遊行向各界宣揚理念（何榮幸，1996）。跨組織結盟源於解嚴前後進入新聞界，具批判性且有運動經驗的記者們關注媒體環境，形成網絡累積知識實踐，在大浪來時共尋出路。

公約引起的爭論經由報紙再現，《自立早報》（1994.8.22: 2）採訪各方看法，學者支持公約但對現實不樂觀；社運團體支持並點出產業仍不民主；報業經營者認為臺灣條件還不充分；新聞主管則指出社會監督、群眾募資辦新報及具體化公約等方向，可見仍有許多分歧，非四條原則足以涵納。大家進一步協商公約具體面貌，工會推薦早報記者蘭萱、顧秀賢，晚報李季光、蘇惠美四名成員，再邀請早報總編輯蘇正平、總主筆林淇瀆、晚報總編輯李永得三名主管組成小組擬定自立報系編輯部公約草案，公告徵詢意見和修正後與新資方協商，再交編輯部大會討論（台北自立快報，1994.8.29: 1）。小組提出草案版本具體化執行方法，也比一開始四個原則「務實」，如總編輯產生方式改變：

自立報系秉持客觀、公正、本土之基本立場，獨立報導、評論，不受任何黨派、商業、宗教或其他利益團體之左右。

自立報系編採人員應竭盡一切可能，真實、完整報導所有公共議題，不為私利、無所偏袒、無所畏懼。

為貫徹實踐前述基本立場與新聞編採獨立自主之原則，特定左列條款：

- 一、發行人為本報系編輯政策最高負責人，在發行人之下，各報設編輯委員會，其成員各九人，產生方式如下：
 1. 發行人、社長、總編輯、總主筆為當然委員。
 2. 二級以上主管或具五年以上編採專業經驗者，得由具投票資格之編輯部成員票選五人為委員。其任期為一年，得連選連任。
- 二、編輯委員會得決議編輯政策、討論編輯部所擬預算、仲裁編輯部人事案，每月定期開會一次，以發行人為召集人。若有三位以上委員連署要求召開臨時會議，發行人不得拒絕或藉故拖延。
- 三、總編輯為編務最高負責人，秉新聞專業理念，執行報社之編輯政策。
- 四、總編輯之人選由發行人提名，經入社一年以上之記者編輯、編譯，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行使否決權，若遭應有票數三分之一以上反對者，董事會不得任命之。發行人所提總編輯人選如遭否決，應改由編輯部具投票資格之人員，推薦票選之，以獲應有票數二分之一以上者，供董事會任命。
若編輯部無法依前款產生總編輯人選，則由發行人提名經董事會通過任命。
- 五、總編輯就職兩年後，應重新行使前條之任命程序。

- 六、總編輯對所屬各單位主管或主編有提名供社方任命之權，社方對所提人選不同意時，送交編輯委員會仲裁。
- 七、總編輯必須每月召集一次編務檢討會議。
- 八、記者、編輯對新聞之處理，不受其觀點之不同，而受懲罰。
- 九、本報系設置編輯顧問委員會，由社外各界專業人士組成，其成員十一至十五人，經編輯委員會推薦後，由發行人聘任，任期兩年。
- 十、本公約經本報系編採同仁大會通過後，由發行人公佈實施，並送董事會備查。修改亦同（台北自立快報，1994.8.31）。

公約開頭再次強調「客觀、本土」並說明「追求完整報導公共議題」前提，包含影響新聞產製的編輯委員會、總編輯權責、記者編輯保障，還有不同層級的定期檢討，再到編輯顧問委員會的外部監督，草案想像了編輯部與資方共治的願景。此時需對抗的已不只是戒嚴時期的國家，還有報社內部權力控制和金權資本，因此草案中政府身影已不再出現。九〇一小組和各界共同發起的「推動編輯部公約運動」連署在此期間持續尋求社會支持，倡議者提出進一步籌組跨媒體自主性組織以提升專業與維護記者權益（自立早報，1994.8.24: 2），行動開始超越個案尋求整體改革。推動新聞專業組織時「維護新聞工作者勞動權益」重新現身公共論述與「新聞專業自主」並列組織議程，埋下後續路線差異的遠因。

二、記者編輯上街頭！「九〇一為新聞自主而走」與新聞專業組織

新聞界、學界與九〇一小組決定以不同方式「慶祝」即將到來的記者節——舉辦臺灣第一次新聞工作者為主體的遊行「九〇一為新聞自主而走」，傳單寫著新聞業到了關鍵時刻，「我們才剛從戒嚴時期爭取抵抗公權力不當干涉新聞自由獲取小小斬獲，卻又面臨新聞事業經常為企業經營利益威脅的危機，外來干涉滲入媒體內部機制影響閱聽大眾知的權利」，⁹ 小組推出三個訴求：爭取內部新聞自由、推動編輯部公約、成立新聞專業組織（自立早報，1994.8.25: 2），這場遊行的動員網絡和參與者在兩個意義反應出多元群體結盟。

第一種是工運團體參與並詮釋運動意義，例如 1992 年成立的「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以過去記者不當解雇案例闡述想像中產業民主的「報紙理想國」：票選總編輯還要票選頭條新聞、有編輯公約還要團體協約，廣告共同決定內容；國家介入限制報業占有率並補助邊緣報紙進而成立公共報紙；新聞業由白領（記者、編輯、業務）、藍領（製版、印刷、運輸）、灰領粉領（檢排校對）、讀者群眾「四大族群共和」，並成立「跨媒體工會」，追求媒體「展現弱勢者被壓迫的真實權力結構」。工委會「白領藍領鬥陣行」歌曲，「我們都是新聞工人，我們不分藍領白領，白領付出腦力精神，藍領奉獻體力血汗」等歌詞（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1994）顯示與自立工會及聲援者相異的「左翼媒體」路線，強調階級分析與產業民主但對「專業、客觀、公正」等古典自由主

⁹ 節自〈「901 為新聞自主走」之一 為何上街頭？〉，傳單有回條可勾選支持催生新聞專業組織、贊助活動經費及填寫姓名、職稱與聯絡方式。

義式的媒體價值不加強調，區隔與重視勞工階級團結的路線相比，較為「保守」的專業主義路線。雖然工委會加入聲援並另提訴求，顯示不同運動都在搶救自立過程中找到發聲角度，然而其訴求終究較少被結合到運動整體訴求中並留下遺緒。

第二是透過運動建立聯盟進行行動的學生。遊行宣傳期間九〇一小組表示希望有意從事新聞工作的學生「不要錯過參與並觀察的機會」（自立晚報，1994.8.25: 2），一群學生在參與遊行中結識發起「進步傳播學生組織」，當天散發連署書並收集聯絡資訊，發起辭中寫道：媒體是現階段核心問題，變革年代傳播院校學生作為產業預備人才與研究者應有批判的理想，投入媒體改革並重建學院的傳播學術，所以「我們參與了台灣一批進步傳播工作者爭取專業自主的遊行，藉此時機發起進步傳播學生的跨校組織，新的想法與做法就此開始」。¹⁰「進入媒體前的學習者」嘗試標示媒體影響力，自我定位改革責任並開始組織，投射的媒體想像是專業自主的社會公器。這群學生來自輔大、政大、文化、世新等校，前幾年就已開始組織讀書會與觀察團，此時進一步的催化，遊行後定名成立「傳播學生鬥陣」（傳學鬥），往後多次參與媒體改革行動（鄭涵文，2014，頁 6-8），組織持續運作至 2014 年下半年。¹¹

8 月 30 日小組在《中時晚報》刊登全版廣告：支持「編輯部公約」運動聲明與新聞界、學界、文化界、社運界連署名單（中時晚報，1994.8.30: 12），第二次廣告連署人數比第一次更多，來源也更廣泛，展現運動實力與社會支持。遊行前一天早報以「九一為新聞自主而走大家作夥來」報導（自立早報，1994.8.31: 2），晚報副刊也全版圖文細數自立貢獻，包含重大事件與經營突破等（自立晚報，1994.8.31:

¹⁰ 節自〈進步傳播學生組織的發起辭〉傳單（1994 年 9 月 1 日）。

¹¹ 感謝鄭涵文小姐協助提供傳播學生鬥陣的組織運作時間。

19)。

遊行當天約五百人在中正紀念堂集合，戴上口罩象徵噤聲抗議，接著摘下口罩拋向天空象徵拒絕不當干預。原預計由文大學生製作的「新聞自主號」領頭但因颱風取消，隊伍分為新聞界與學術文化社運界兩隊，台教會、澄社、二二八家屬、工運團體都前來聲援，中間穿插「打破新聞干預」高蹺隊與行動劇團，經中山南路、信義路、金山南路，到濟南路進入立法院召開記者會（自立晚報，1994.9.1: 2）。會中學者徐佳士、公視新聞部副理楊憲宏、進步傳播學生聯盟籌備會代表洪貞玲都發言支持遊行訴求並批判現有傳播體制，當場近兩百人簽名願意擔任自主新聞專業組織發起人（自立早報，1994.9.2: 2）。

這天上街的意義是重塑「以記者為主體」的記者節。1934 年國民政府頒布九月一日為記者節，戰後移植到臺灣，每年報老闆與新聞主管集會「吃吃喝喝、摸彩頒獎」（林瑩秋，1994 年 9 月 4 日），1994 年記者節同樣在中山堂「長官訓示摸彩」，但完全被當作九〇一遊行的對比（自立早報，1994.9.2: 1）。慶祝集會由「臺北市記者公會」主辦，各縣市有多個記者公會，全國性有「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並不是沒有相關團體，為何還需要成立「自主的」新聞專業組織？原因是記者公會只剩下聯誼功能，無法真正代表記者爭取權益促進專業，且成員多是報老闆或管理階層。新評會則由數個相關組織組成接受申訴，由「社會賢達」擔任委員但也無力面對漸趨多樣的問題，不被第一線記者認同（自立早報，1994.8.29: 2）。遊行後的座談會《新新聞》發行人司馬文武批評新評會大部分成員不懂新聞，且會務由秘書長，總統女婿賴國洲負責完全不當；中國新聞學會則由國民黨前文工會主任楚崧秋擔任理事長無法代表臺灣新聞界，這些萬年組織毫無功能（自立晚報，1994.9.2: 2）。

新聞界與學界積極想像專業組織的內涵，楊憲宏建議大家退出無用且敗壞的記者會並成立「真正屬於記者」的組織；財訊梁永煌接著提出新組織應能保障權益、革除陋習，社群專業共同成長（自立晚報，1994.9.3: 2），而非過去記者會「前臺摸彩、後臺作票」，分派特權利益扮演國民黨新聞黨部化身（紫嘯鶯，1997）。關注面向各異的行動者們共同想像與辯論新聞專業組織的定位，追求建立新組織並不是單一事件引起，而反映解嚴後新聞界對資本取代國家宰制的長期不滿，終透過自立事件爆發並尋求改革。

遊行後報社基本運作開始出現問題。9月4日影視版刊出「狼人生死戀」影評寫道情節與自立事件相似，然而見報時兩處「自立」被塗銷，剩下『「狼人生死戀」的部分情節竟與「 事件」雷同』、「台灣 報系股權移轉後人事變動」（自立晚報，1994.9.4: 15）。影視版工作人員發現後相當不滿，比對工作流程認定塗改發生在製版完成到照相間的二十分鐘，且「可能是報社內部熟悉作業流程者所為」（自立晚報，1994.9.6: 2），要求社方查辦但無結果（台北自立快報，1994.9.6: 1）。

圖 6：「自立」遭到塗銷的影視版面



資料來源：〈戲如人生 人生如戲〉，1994 年 9 月 4 日，《自立晚報》，15 版。

遊行後新聞環境並未就此改善，有記者被報社秋後算帳，連署名單被各媒體「特別關注」（楊憲宏，1994 年 9 月 5 日），自立內部問題持續卡關，9 月 8 日終談成「六個月自由去留」，退休標準資遣保障期六年共識交工會會員表決（台北自立快報，1994.9.8: 1），以 457 人同意、17 人反對通過（台北自立快報，1994.9.12: 1）。9 月 12 日自立股東大會改選董監事，陳政忠仍未掛名但其金村投資公司掌握三分之二席次，包含新任董事長兼發行人郭正昭、董事兼社長陳榮傑、陳政忠胞弟陳政輝等（自立早報，1994.9.13: 2）。9 月 21 日自立晚報社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郭正昭與自立晚報社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法定代理人王

幼玲、陳俊宏和馬紀堯終於簽訂協議書，隔天公告離職資遣申請程序開始受理（台北自立快報，1994.9.21: 1），至10月3日有43人提出（台北自立快報，1994.10.3: 1）。總編輯李永得10月15日離職，他認為若留下甚至升官等於是利用工會跟資方交換條件，他不願被利用（陳怡璇，2008）。

至於編輯室公約，陳政忠提出號稱「比工會公正客觀」版本，由社內主管組成編輯委員會與社方指派社外人士組成編輯顧問委員會，定期檢討報導與報社方針，並對社長提名的總編輯行使同意權。工會認為扭曲內部新聞自由且將「業務影響編務」制度化（自立晚報，1994.9.7: 2）。協商過程副社長馬兆宗定位公約為公司內規而非團體協約，董事會通過交社長執行即可而不需「簽署」，且不該由工會協商（自立晚報，1994.9.27: 3），工會認為資方無誠意且不了解公約精神拒絕再談，雙方僵持到10月中（自立晚報，1994.10.13: 4），最終沒有結果但抗爭者不放棄，《台北自立快報》最後一期強調「編輯室公約沒有簽訂，抗爭就不會結束！員工權益沒有保障，抗爭就隨時會再起！歷史不會記住這一天，因為快報沒有賣給阿忠！」（台北自立快報，1994.10.12: 1），參與者事後分析公約失敗大多認為主因是資方沒有誠意加上外部壓力不足（涂建豐，1996b）。

自立事件從「搶救自立」行動，到「內部新聞自由」論述，再到推動「編輯室公約」運動及「九〇一遊行」，最後倡議「新聞專業組織」，從單一報社事件成為跨媒體議題，轉化為推動整體社會改革，與此同時改組後的自立發展並不順利，內部運動並未達成訴求反而逐漸消沉。外部運動則持續發展，包括籌組專業組織以及推動公約。接下來將有三條軸線同時發展，包含自立報系、其他媒體，與新聞專業組織，三者處於不同運動階段。自立內部仍有改革行動但發展有限，其他報社則受相當程度影響，而專業組織處於初生階段持續凝聚與建立制度。

三、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成立與編輯室公約的擴散

自立事件中介了解嚴前後媒體改革能量，邁向專業組織與編輯部公約之路。前者將由「九〇一小組」轉型為「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簡稱記協），後者推動公約在不同媒體遍地開花，而事件起源——自立報系的新聞自由、員工權益與經營每下愈況。最終「搶救自立」、「九〇一為新聞自主而走」成為媒體改革的重要象徵，在往後運動中被召喚，記協及相關組織也持續推動媒體改革。本節將分別討論制度、組織與象徵層次，自立事件留下的遺緒。

遊行後九〇一小組開始籌備專業組織，10 月 15 日正式召開「催生新聞專業組織」研討會，關於組織定位，彭琳淞認為要提升專業自律並參與政策制定，前中時記者吳永毅與被中央日報開除的蘇諍強調保障記者工作權並批評所謂「專業組織」可能只是維護專業人員既得利益。而組織形式，中時記者林照真認為可從鬆散社團開始，另一中時記者張瑞昌則提醒中南部組織的重要，司馬文武認為可以參考香港記協，以基層人員為主但不排斥主管參與（自立晚報，1994.10.16: 3）。會中專業主義與工會路線差異再次浮現，兩者對優先順序與組織定位的不同想像將持續產生影響。

小組每周開會籌備組織並發行《901 通訊》傳達資訊與倡議理念，第一期 12 月發行，出刊五千份後加印兩千份，報導自立事件過程與組織籌組訊息，也介紹其他媒體新聞自主與政商利益的衝突（901 通訊，1994.12.15: 1）；隔年初發行第二期，宣傳組織近況並討論業採合一等議題（901 通訊，1995.1.10: 3）。1995 年 1 月 14 日記協舉辦發起人大會並成立籌委會，九〇一小組功成身退。章程草擬現任編採人員（一般

會員）、新聞學者（特別會員）與傳播科系學生（預備會員）皆可入會，組織目標為保障記者權益與推動媒體改革，包括何榮幸、馮賢賢、鄭村棋、李永得、徐璐等媒體工作者參與，徐佳士、李金銓、鄭瑞城、翁秀琪等學者則擔任顧問。會中選出 25 名籌備委員，由《自由時報》記者何榮幸擔任召集人（自立早報，1995.1.15:3）。

3 月 29 日記協於臺大校友會館正式成立，選出 11 位執行委員，何榮幸當選會長，香港明報駐臺記者賴秀如與聯晚記者楊汝椿擔任副會長，並組成紀律組、媒體調查組、勞工關係組、校園事務組、研究發展組與財務組，初期推動新聞倫理公約及「向紅包文化說再見」等行動（何榮幸，1996，頁 102-106）。1997 年《目擊者》雙月刊創刊，延續抗爭以來發行刊物論述宣傳。記協制度化運作代表對抗性的運動進入尾聲，各種「溢出日常」的行動轉為「常態」的實踐。專業主義和工會路線的辯論在《當代》雜誌展開，馮建三（1994）指出「工會」被迴避原因是白領不願與藍領聯合，或地區性記者工會不足以組成全國記者工會，又或是認為「專業」比「工會」能引起社會支持，他主張講出工會以促進階級結盟。涂建豐（1994, 1995）認為沒有強調「工會」是因為抗爭目標為彰顯「專業主義」而非另一波工會運動，然而他也同意兩者可以結合，編輯室公約就是新聞專業在勞動契約的落實，只是必須辨明兩者不同，記協任務是宣示新聞專業需要更多自主與自律。何榮幸自認屬「以協會之名行工會之實」路線，最終專業主義在內部討論中成為多數，但仍設置「勞工關係組」兼顧新聞工作者權益（何榮幸，1996，頁 101）。

記協正式成立彰顯自立事件從個別工會到跨媒體連帶，舉辦遊行壯大聲勢凝聚共識，事件結束後轉化為正式專業組織來延續理念與推動訴求（彭琳淞編，2021，頁 209-210）。記協持續在媒體改革運動中發揮力量，其定位顯示了專業主義與工會路線間的選擇。自立工會與記協的

參與者在訪談中強調，推動記協成立並不是為了「再發起一個跨媒體工會」，而在於「建立專業組織」，提升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自主並以之強化社會改革的力量（受訪者 2）。記協最終定位作為專業組織而非工會，工會路線留下的遺緒在於對記者勞動權益的關注與協助，然而在保障工作權以維護專業自主的框架之下。

除了促成專業組織，遊行另一訴求編輯部公約也成為制度化實踐。當時公視正在籌備，1993 年《公共電視法》提出到 1997 年三讀，過程中自立經驗是重要參考，九〇一小組與記協推動公視法並遊說加上「訂定編輯部公約」條文（馮賢賢，1994 年 9 月 2 日），成功推動公視法第二十七條「為保障新聞專業自主，新聞部工作人員應互推代表三至五人，與總經理製訂新聞製播公約。」在公視成立後訂定公約。財訊總編輯梁永煌時常聲援抗爭，1994 年 10 月財訊開始研擬編輯室公約；台中民主台也在 1994 年選前通過「新聞自主公約」表態選舉保持公正（自立晚報，1994.10.13: 4）。多年後蘋果日報面臨易主，工會推動編輯室公約，雖然買賣破局但協商後 2013 年 4 月勞資雙方簽訂團體協約地位的公約，內容與自立運動訴求類似，唯總編輯仍是資方任命，另也納入拒絕置人性行銷等新課題（Newtalk 新聞網，2013.4.18）。往後各電視臺大都建立專業與倫理規範，¹²編輯部公約成為公共議題後許多新聞工作者各自推動，較「開放」的媒體也以訂定公約來宣示公司誠意，公約成為實踐媒體改革的工具之一，多年後公約已成為媒體易主時，員工捍衛權益時的訴求。編輯室公約在自立事件中被提出，進而進入媒體從業

¹² 例如〈TVBS 新聞道德與採訪守則〉、〈中天新聞自主公約〉、〈中視新聞自律規範〉、〈公共電視處理新聞性節目申訴案件作業流程〉、〈公廣集團新聞專業倫理規範〉、〈民視電視公司新聞部新聞自律規範〉、〈客家電視新聞採訪編輯手冊〉、〈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原住民族電視臺新聞部自律公約〉、〈壹電視新聞臺新聞自律公約〉、〈華視節目製播自律規範〉等（依筆畫排序）。

人員的視野和認知成為被共同認可的制度，儘管較著重專業自主的面向，而產業民主的實踐較為有限，且實際能發揮的效果在各媒體落差甚大，但無疑作為記者編輯維繫自主性的工具之一。

對比下自立易主後持續惡化。首先新資方關掉未虧損的文化出版部（台北自立快報，1994.10.4: 1），接著陳政忠以公司資源進行個人競選（台北自立周報，1994.10.26: 1），還有晚報總主筆林倖一以社評為宋楚瑜辯護（自立晚報，1994.10.27: 11）。自立沒有因陳政忠入主重獲新生，歷經多次社務調整與立場搖擺陸續有超過三百位人離職（呂東熹，2010，頁 534-535）。1999 年 1 月早報突然宣布停刊並資遣大量員工，衝突再起但社會關注遠不如前幾次易主（林富美，1999），陳政忠在 2 月賣掉自立報系，由建商張慶忠接手，2000 年 8 月又賣給臺北市議員王世堅，最後陷入混亂，拿不到薪水的員工 2001 年 10 月宣布停刊，工會接管復刊自救，2002 年 1 月再度停刊處理積欠薪資，6 月復刊。至此讀者基礎流失殆盡，自立版圖也在市場消失（呂東熹，2010，頁 545-575；向秋玲，2005）。

作為「新聞媒體」已消失的自立報系在後來媒體改革運動「現身」。「自立事件」、「九〇一上街頭」成為象徵「新聞自主」、「抵抗干預」的符號，召喚集體記憶，面臨新威脅時凝聚認同。2012 年中嘉案掀起反媒體壟斷運動，記協主辦九〇一遊行，主題「你好大，我不怕」。相隔十八年自立事件再被提起，前自早記者陳增芝以「18 年後，自立工會又下 901 動員令！」為題寫下「有一群人，對自立人的身份念念不忘，甚至不時有小聚會。已成歷史的自立工會幹部，發了一個 901 動員令，相信來自四面八方的自立人，都會義無反顧吧。」¹³蘇正平指

¹³ 引自陳增芝（2012 年 8 月 19 日）。〈18 年後，自立工會又下 901 動員令！〉。

【臉書網誌】。上網日期：2022 年 7 月 16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陳增芝/18年後自立工會又下901動員令/10151033143275003/>

比起 1994 年自立事件面對挾帶政商利益的小政客，2012 年則面對靠攏中國的大財團，前者毀滅一個媒體，後者毀滅整個媒體環境（蘇正平，2012 年 9 月 3 日）。自立事件是捍衛媒體公器的參照原型，多年後重述自立事件與當下情境，宣示同樣關心媒體環境的心情與持續推動改革的意義，在象徵層次上自立事件繼續發揮作用。自立事件本身亦成為媒體改革與抗爭的符號參照，讓後續媒體改革與抗爭能夠指認與建立連結，進而宣稱其正當性與歷史傳承，甚至學習其抗爭劇碼、論述或解決方案。

四、自立事件的遺緒：組織、制度與象徵層面

從搶救一個媒體到關切整體環境，自立事件突顯「國家退場，資本介入」的危機，結合傳播學界對內部新聞自由的研究，透過推動編輯部公約與新聞專業組織尋出路。過程中和工運與學生群體的互動呈現運動參與者多樣性與分歧位置，投射出後續路線差異。自立事件留下組織、制度與象徵三個層次的遺緒。在組織上促成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誕生，其中專業主義與工會路線映照出事件的兩條軸線；另外也催生傳播學生鬥陣，和許多參與的記者或學者往後組成其他組織投入改革。在制度上引發推動編輯部公約運動並具體打造公約，使其他媒體工作者能推動擴大影響範圍。最後象徵上與九〇一遊行成為媒體改革重要象徵和後續運動的敘事資源持續被記憶與再現。從運動起源（*initiator*）與擴散（*spin-off*）分析，自立事件是重要的起源運動，培訓大批參與者的運動和論述經驗，在行動劇碼、運動論述與組織型態等面向影響後續運動；也有許多參與者的生命經驗在運動中被改變（*McAdam, 1995*）。

自立事件發生在解嚴後國家鬆綁媒體管制，資本大舉進場的環境；

同時國家鬆綁社會控制降低抗爭門檻。國家同時影響媒體環境與抗爭的政治機會，自立事件催化足夠的社會不滿使集體行動出現。運動呈現高度「理念中介」，新聞工作者、傳播學者這些嫻熟文字使用的運動者不斷將訴求命名、指認、概念化、辯論，進而定位並獲取象徵正當性，再將這些指稱轉化成資源進行動員，訴諸組織與群眾。這些符號不是憑空的發明，而是行動者參酌當下資源經歷象徵鬥爭，轉化現有概念奪取其意義，例如記者節與九〇一，批判既有組織無用以突顯新組織，詮釋運動為維護「大眾知的權利」等。然而驅動事件的自立報系在易主後編輯自主流失，經營也未起色，聲譽與讀者全失，最終再次轉賣，員工權益也再次受損。多次轉手後不再有影響力，在「搶救自立」意義上可說是失敗，然而搶救自立卻引發一系列運動，留下許多遺緒並持續影響臺灣媒體環境與媒體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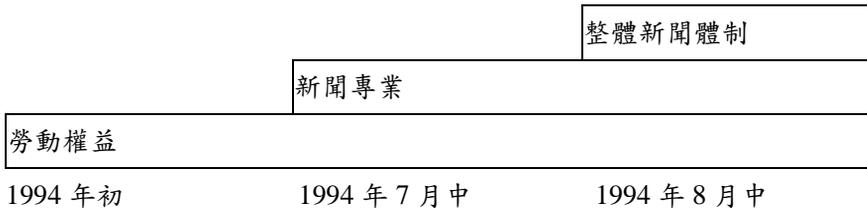
伍、結語

過往討論民主轉型過程的媒體變遷大都以「國家退場、資本進場」看待管制鬆綁與資本集中，本文分析政治經濟與媒體關係變化的歷史時刻，民間報業受衝擊時新聞工作者與公民社會的集體行動如何推動媒體環境邁向新階段。自立是戰後重要的本土媒體，解嚴後在優勢報業競爭下虧損，新成立的自立工會抗爭裁員的經驗是後續行動重要基礎。1994年台南幫欲出售自立，由三重幫陳政忠購買，自立工會連結社運團體、學界、文化界與其他媒體工作者，將事件從內部爭議形塑為公共議題，引起社會關切使事件被公眾關注，各界串聯強調自立在民主進程的角色，同時擔憂新資方破壞新聞自主。他們買下全版廣告刊登「搶救自立」聲明，內部運動開始轉向外部，自立記者報導消息，從前階段僅有

內部新聞到接下來出現外部新聞，成功引起社會關注。

接著自立記者們呼籲新資方簽訂編輯室公約，具體化「維護新聞自主」訴求但未成功，新資方交割當天撤換早晚報的總編輯，於是工會「票選總編輯」產生臺灣新聞史上首次記者與報社員工票選的總編輯，並在報社易主隔天留白頭版抗議。抗爭過程中運動者組裝不同來源的論述，包括重新詮釋自立報系「抵抗威權」的歷史意義與自歐美引介的「內部新聞自由」論述提供建構規範以解決危機的參考，進而打造在地的「新聞專業自主」概念，轉化經營權易主為公共議題爭取社會支持。自立事件突顯國家與資本雙重力量威脅新聞專業自主的結構性困境，因此搶救自立突破單一報社格局，新聞工作者、社運團體與學者上街提出，透過編輯室公約和新聞專業組織兩個短期目標來追求新聞自主的長期目標。

圖 7：自立事件關注焦點變遷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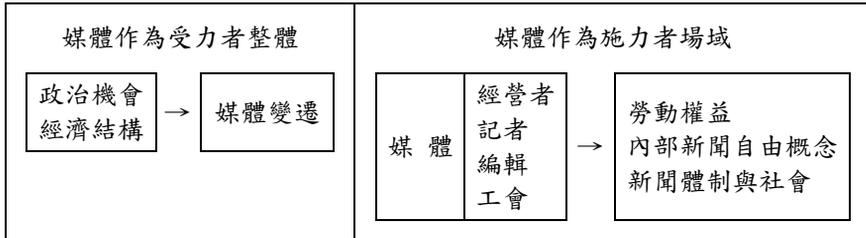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圖。

風雨中的九〇一遊行，首次新聞工作者上街頭，出現既有工運組織以及浮現中的傳播科系學生結盟，前者再次突顯工運脈絡，後者促成傳播學生鬥陣組成。遊行奪取官方過往壟斷的記者節詮釋權，批判記者公會、新評會等組織，並思考臺灣需要什麼樣的新聞專業組織，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籌組過程的專業主義與工會路線爭論就是如此。經過這段歷程

事件留下多面向遺緒，組織上催生記協，制度上建立編輯部公約原型並向外擴散，象徵上則是媒體改革的符碼與號召。然而搶救自立本身並不成功，不僅沒有成功阻擋報社經營權轉讓，易主後勞動權益最終僅獲打折保障，資方仍不願簽署公約，幾年後自立再次易主最終走入歷史。許多新聞工作者／運動者離開加上後續經營者風格使自立報系不再對社會重要，其危機難再引起社會共鳴。如同圖 7 以疊加的方式說明，在這個歷程中，運動的焦點從一開始的「勞動權益」，到引起社會矚目後訴求「新聞專業」，最終推動整體環境改革。在這個過程中，並非由一個階段轉向下一個階段，而是持續擴大關懷的對象，雖然焦點有所變遷，但前階段之訴求亦被整合進下階段的運動關懷中。

解嚴前後扭曲的媒體環境透過自立事件引爆，最終導向媒體環境改革，搶救自立本身並未成功，然而在勞動權益與新聞專業都留下許多遺緒，自立報系在媒體意義早已消失，但自立事件從未消失，反而透過後續媒體改革發揮影響至今。回應本文提問，分析自立事件對我們理解時代有什麼幫助？在媒體與民主化的研究中媒體大多作為「受力者」，即政治經濟造就媒體變遷，然而媒體作為「施力者」也會回應影響社會。再者「媒體」在這個視角被當為一個整體，但媒體實際上是一個內部有許多不同行動者互動衝突的場域，本文拆解媒體被掩蓋的內部過程，視媒體為異質且「不屬同一整體」的場域，多元行動者在其中互動之總和，突破新聞史作為政治史附庸，指出媒體具有的自主性（Curran, 2002），才能適切分析報老闆、工會及不同部門新聞工作者其間的互動，再往外延伸到學者、社運團體和報紙讀者的角色。

圖 8：媒體作為受力者整體與施力者場域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圖。

媒體兼具「受力者」與「施力者」角色，管制鬆綁使市場在資本競逐中扭曲失衡；然而政治機會開放也使集體行動成為可能，媒體受政經變遷衝擊，報老闆、記者編輯與工會以各異的行動回應，報紙作為重要的能動者透過「搶救一份有尊嚴的報紙」及延伸的行動使改革啟動。記者是其中關鍵角色，在社會脈絡與勞動過程交錯下形塑理想媒體圖像，而社會環境與報社變遷造成「形塑行動者」的結構改變，使記者投身追求媒體改革。報紙的特性造就事件特殊性，媒體同時作為運動工具與目標，使自立的報導同時有傳遞資訊和示範「理想媒體」的意義，出現各種「預示」。報紙作為能動者也影響運動論述的轉折，從最早的勞動爭議經歷事件公共化的論述過程演化，學者和社團介入，再組裝「內部新聞自由」概念獲取正當性，接著透過既有網絡形成跨媒體行動，以推動編輯室公約與新聞專業組織延續運動能量並邁向改革的常態化，經過運動者的構框與推廣（framing and promoting），事件進程才發生改變。

本文將自立事件放在解嚴前後媒體環境變遷與社會運動的時代脈絡中討論，自立事件並非獨立發生，進而留下影響，1990 年代臺灣社會積壓數十年的社會問題「百病齊發」，各種社會運動與抗爭，都觸發特定領域長期累積的社會改革訴求，所以自立事件得以從單一報社的勞動爭議，轉向推動新聞專業自主，以及跨媒體的整體環境改革。也因為自立

事件中介了媒體改革的不同力量，本文看見媒體場域中的不同行動者都參與其中，使運動論述的結構呈現內部複雜而非單一來源，依據情境組裝成為特定的樣貌，且新聞場域不再只是被動受到政治經濟影響，也能夠回頭改變環境。而自立事件的特殊性還在於，運動目標與運動工具的重合，自立報系的員工為了搶救報社，透過報導與評論來提出主張、引起關注與號召支持，且這群新聞工作者不同於其他勞工，他們具有熟練的書寫與論述能力，加上工作特性，最終發展出專業自主的追求與主張。

討論三十年前媒體變遷與改革運動的當代意義在於重新反省新聞體制和衍生的集體行動。自立事件與記協是目前僅有以「新聞工作者」為主體的媒體運動組織行動，後續如 2000 年前後的「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觀）、「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無盟）及其轉型的「媒體改造學社」，都主要由學者發起組成，2013 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與「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則由學生主導（洪貞玲，2006；劉昌德，2015；魏环，2009）。當年自立事件強調「新聞自主」除了批判國家與資本力量，並未特別強調「媒體公共化」，甚至有許多「挽回台南幫」的呼聲，寄託希望在「比較好的資本家」而非「不要資本家，要公民社會」。到了 2000 年前後的媒體改革，曾被思索的「公共化」方案才再次浮出檯面，再到更晚近又擴及中國因素等議題。當年的重視「勞動權益」與「專業自主」兩個不同面向的新聞工作者、組織者與學者，後續的實踐以及路線的變化，包括各媒體與個別記者的編採工作，以及媒體改革的倡議主張和傳播政策的制定，也值得在未來繼續觀察。

當今媒體有更多挑戰，不論是資訊化與數位匯流對紙本媒體以及傳統廣電媒體的衝擊、新聞工作者勞動條件的惡化、置入性行銷影響新聞自主，乃至現有的傳播教育與工作環境下惡化的新聞品質與記者聲望。

媒體改革之於當代公民社會仍然重要，然而比起學者或學生，記者面對惡化的工作條件加上龐大政商結合體，控制更加全面。比起解嚴前後，當今的支配變得隱蔽不易指認，新聞記者形構追求改革的集體行動更為困難，甚至更加志願與順服。重新檢視新聞工作者為主體的媒體改革行動，對看見物質與象徵上的威脅，包含勞動權益和新聞自主受到的宰制，並思索改革行動，有很大的意義。

參考書目

- 〈1994 年 6 月 14 日高清愿先生談話錄〉（1994 年 6 月 17 日），自立報系產業工會內部文件。
- 〈7 人小組 草擬編輯部公約〉（1994 年 8 月 29 日）。《台北自立快報》23，1 版。
- 〈901 為新聞自主開跑 跨媒體小組發起遊行活動提出三大訴求〉（1994 年 8 月 25 日）。《自立晚報》，2 版。
- 〈「901 為新聞自主走」之一 為何上街頭？〉傳單（無日期），作者收藏。
- 〈「搶救自立」聲明 請維護自立報業自主風格〉（1994 年 7 月 19 日）。《中時晚報》，12 版。
- 〈「關切自立」聲明—請維護自立報業自主風格〉（1994 年 7 月 19 日）。《自立晚報》，2 版。
- 〈【搶救自立系列】悲情自立 曾經走過風雨的台灣 如今…〉（1994 年 8 月 31 日）。《自立晚報》，19 版。
- 〈一樣節日兩樣情〉（1994 年 9 月 2 日）。《自立早報》，1 版。
- 〈工作權的緊急關頭〉（1994 年 6 月 14 日）。《自立快報》，1 版。
- 〈大事記〉（1994 年 5 月 11 日）。《自立工訊》20，1 版。
- 〈工會提新折衷方案 資方要研究 9/2 下午 2:30 再度談判〉（1994 年 8 月 30 日）。《台北自立快報》24，1 版。
- 〈文化出版部 率先被裁撤 究竟是誰怎麼做的決定？目前無人知道！〉（1994 年 10 月 4 日）。《台北自立快報》52，1 版。
- 〈文化界人士將籌資辦獨立報紙 早報總主筆向陽懷疑陳政忠搶購自立背後另有內幕〉（1994 年 8 月 19 日）。《自立早報》，2 版。
- 〈支持「編輯室公約」運動聲明〉（1994 年 8 月 30 日）。《中時晚報》，12 版。

- 〈白色恐怖籠罩自立報系〉（1994年8月14日）。《自立晚報》，3版。
- 〈台教會發表聲明〉（1994年8月19日）。《自立晚報》，2版。
- 〈本報系編輯室公約草案出爐 總編輯由發行人提名 同仁行使否決權〉（1994年8月31日）。《台北自立快報》25，1版。
- 〈外電報導自立晚報頭版空白新聞 指出報後數小時內銷售一空〉（1994年8月17日）。《自立早報》，2版。
- 〈自立易主 進入倒數計時 不滿經營權轉移 工會舉辦「保衛自立之夜」為員工權益及報格作最後一搏〉（1994年8月15日）。《自立早報》，1版。
- 〈自立晚報 人事難交接 代理發行人首度與編輯部溝通 仍有爭議〉（1994年8月16日）。《聯合晚報》，2版。
- 〈自立晚報成為陳政忠通訊？10/26 晚報陳政忠廣告處理方式引起讀者強烈不滿〉（1994年10月26日）。《台北自立周報》2，1版。
- 〈自主新聞專業組織升火待發 昨遊行後多位學者和新聞工作者隨即召開記者會說明籌設理念 當場有近兩百人簽名共同發起〉（1994年9月2日）。《自立早報》，2版。
- 〈自立陷入白色恐怖 員工要求台南幫停止交易〉（1994年8月13日）。《台北自立快報》10，1版。
- 〈自立救報行動不孤寂 陳定南、陳菊、陳列抵報社聲援〉（1994年8月20日）。《自立晚報》，2版。
- 〈自立報系江山易主 陳政忠主控 郭正昭代理發行人 台南幫退出 高清愿認有利新生〉（1994年8月16日）。《工商時報》，4版。
- 〈自立報系即將被賣掉！〉（1994年8月13日）。《自立晚報》，1版。
- 〈自立報系昨日就編輯公約進行首次協商 勞資對公約位階協商對象差距大〉（1994年9月27日）。《自立晚報》，3版。
- 〈自立報系會員大會：堅持全員退休擇聘案 授權工會 防範新舊資方可能逕行股票交割舉動〉（1994年8月12日）。《自立晚報》，3版。
- 〈自立報系董監事會完成改組 郭正昭出任董事長及發行人〉（1994年9月13日）。《自立早報》，2版。
- 〈自立精神〉，1994年8月15日，《自立晚報》，1版。
- 〈各界發起跨媒體連署 推動編輯室公約運動〉（1994年8月20日）。《台北自立快報》16，1版。
- 〈早報展現真民意 蘇正平真除總編輯〉（1994年8月16日）。《台北自立快報》12，1版。
- 〈赤字擴大·獎金縮水·工會不滿 年終獎金只有一個月 紅包變空包 社長允諾於二月底前提出五項檢討評估〉（1994年1月28日）。《自立工訊》17，1

- 版。
- 〈局勢分析〉（1994 年 6 月 17 日），自立報系產業工會內部文件。
- 〈和三家電視台比起來 有線電視 地下電台 對自立事件較關注〉（1994 年 8 月 17 日）。《自立早報》，2 版。
- 〈爭取新聞自由 捍衛編採人員工作權 新聞記者協會雛形初具〉（1995 年 1 月 15 日）。《自立早報》，3 版。
- 〈明牌 43.37.14〉（1994 年 10 月 3 日）。《台北自立快報》51，1 版。
- 〈社評 抗議中〉（1994 年 8 月 17 日）。《自立晚報》，3 版。
- 〈林義雄來函致意：大家的努力將為台灣新聞自由留生機〉（1994 年 8 月 18 日）。《台北自立快報》14，1 版。
- 〈風雨生信心 901 我們為新聞自主而走〉（1994 年 9 月 1 日）。《自立晚報》，2 版。
- 〈珍重再見〉（1994 年 10 月 12 日）。《台北自立快報》58，1 版。
- 〈哀痛〉（1994 年 8 月 15 日）。《台北自立快報》11，1 版。
- 〈宣揚編輯部公約 催生新聞專業組織 九一為新聞自主而走 大家作夥來〉（1994 年 8 月 31 日）。《自立早報》，2 版。
- 〈為新聞自主而走 九一有遊行〉（1994 年 8 月 25 日）。《自立早報》，2 版。
- 〈保障記者編輯工作權 並維護編輯部新聞自主 傳播學者 媒體工作者 呼籲籌組自主性新聞專業組織〉（1994 年 8 月 24 日）。《自立早報》，2 版。
- 〈記者會會扭曲變形 功能不彰訴求過時 會員充滿資方色彩 淪為辦節慶聯誼會〉（1994 年 8 月 29 日）。《自立早報》，2 版。
- 〈豈容青史盡成灰燼?! 翻開自立 47 年報史，儼然一部捍衛台灣民主艱困的血淚史，昔日「公正客觀超然於黨派」的立場，如今已面臨嚴重考驗〉（1994 年 8 月 14 日）。《自立晚報》，3 版。
- 〈高清愿角逐 KMT 中常委 工總大樓 祭悼三老 「助選團」熱身 蛋砸高清「怨」〉（1994 年 8 月 24 日）。《台北自立快報》19，1 版。
- 〈高雄市記者會會資方色彩濃 大傳工會缺乏專職人員 兩會淪為聯誼性質 功能不彰〉（1994 年 8 月 29 日）。《自立早報》，2 版。
- 〈晚報齊心選總編 李永得壓倒性勝利〉（1994 年 8 月 16 日）。《台北自立快報》12，1 版。

- 〈晚報影劇版塗改事件正調查中 你到底是誰？〉（1994年9月6日）。《台北自立快報》30，1版。
- 〈連署廣告一波三折 自立不能搶救自立〉（1994年7月19日）。《台北自立報報》14，1版。
- 〈陳定南競選總部 抨自晚社評為宋楚瑜競選 總主筆林倖一表示 該篇社評乃就事論事 並無刻意替候選人助選〉（1994年10月27日）。《自立晚報》，11版。
- 〈陳政忠版編輯部公約不如不要 自早總編蘇正平：如此公約不過是遮掩資方企圖的遮羞布〉（1994年9月7日）。《自立晚報》，2版。
- 〈創刊辭〉（1994年8月3日）。《台北自立快報》1，1版。
- 〈進步傳播學生組織的發起辭〉傳單（1994年9月1日），作者收藏。
- 〈報紙獨立建國宣言：工運及弱勢團體想像中的報紙理想國〉傳單（1994年9月1日），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
- 〈報業經營者：余範英對自立事件感到傷心 蔡建仁認為要出資人全線撤離很難〉（1994年8月22日）。《自立早報》，2版。
- 〈勞資雙方今天上午簽署八點協議書 離職資遣 9/22 開始申請〉（1994年9月21日）。《台北自立快報》42，1版。
- 〈勞資雙方對編輯部公約內容有嚴重歧見 自立報系編輯部公約 簽訂陷僵局〉（1994年10月13日）。《自立晚報》，4版。
- 〈買廣告 送新聞 業採合一 新聞公信擺一邊〉（1995年1月10日）。《901 通訊》2，3版。
- 〈資方與工會談判協商紀錄 最快 9/16 生效實施 觀察期 6 個月 保障期 6 年 9 月份起先調薪 5% 明年 1 月再調薪 5%〉（1994年9月8日）。《台北自立快報》32，1版。
- 〈催生新聞專業組織 香港記協模式可參考〉（1994年10月16日）。《自立晚報》，3版。
- 〈催生新聞專業組織 記者會實錄（上）〉（1994年9月2日）。《自立晚報》，2版。
- 〈催生新聞專業組織 記者會實錄（中）〉（1994年9月3日）。《自立晚報》，2版。
- 〈會員票決接受協商方案 八點方案董事會准予備查〉（1994年9月12日）。《台北自立快報》35，1版。
- 〈搶救自立！請台南幫重視多數員工心聲〉（1994年8月13日）。《自立晚報》，3版。

- 〈跨媒體爭取新聞自主 財訊台中民主台率先響應〉（1994 年 10 月 13 日）。《自立晚報》，4 版。
- 〈經過馬拉松會談 雙方仍有重大歧見 8 月 11 日會員大會議決〉（1994 年 8 月 2 日）。《台北自立報報》26，1 版。
- 〈新聞主管：編輯室公約考驗總編輯能力 仍嫌不構具體 不夠熟悉〉（1994 年 8 月 22 日）。《自立早報》，2 版。
- 〈新聞記者：其他媒體同業不應冷眼旁觀 兼顧新聞自由及資方立場是種「妥協」藝術〉（1994 年 8 月 22 日）。《自立早報》，2 版。
- 〈傳播學者肯定爭新聞自主行動 但指在資本主義政經結構下新聞專業品質與媒體經營者利益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應再加深思〉（1994 年 8 月 17 日）。《自立早報》，2 版。
- 〈溫馨咖啡情〉（1994 年 7 月 6 日）。《台北自立報報》3，1 版。
- 〈趙少康等聲援自立報系自救〉（1994 年 9 月 2 日）。《中國時報》，14 版。
- 〈維持報格！各界聲援紛至沓來〉（1994 年 8 月 13 日）。《自立晚報》，3 版。
- 〈漫畫〉（1994 年 8 月 14 日）。《自立晚報》，1 版。
- 〈漠視會員大會決議 社長：阿忠不會答應全退案 工會全力防堵「強行搶婚」〉（1994 年 8 月 12 日）。《台北自立快報》9，1 版。
- 〈對新資方不願簽「編輯部公約」表遺憾 六名編採言論部門主管將退出報系〉（1994 年 8 月 16 日）。《自立早報》，2 版。
- 〈維護報格 同仁發起編輯部公約連署〉（1994 年 8 月 4 日）。《台北自立快報》2，1 版。
- 〈影視傳真 戲如人生 人生如戲 電影情節往往模仿真實事件 真實生活中卻也見得到電影情節〉（1994 年 9 月 4 日）。《自立晚報》，15 版。
- 〈影劇版新聞在大樣付梓過程中遭「新聞檢查」 編輯部促社方徹查嚴辦〉（1994 年 9 月 6 日）。《自立晚報》，2 版。
- 〈學者專家：成立新聞職團有助保障編採人員自主空間 媒體內部不民主是社會不民主的反現〉（1994 年 8 月 22 日）。《自立早報》，2 版。
- 〈學術界文化界 聲明支持「編輯室公約」〉（1994 年 8 月 17 日）。《自立晚報》，2 版。
- 〈歷史會記住這一天〉（1994 年 8 月 16 日）。《自立晚報》，1 版。
- 〈關心自立 挽留台南幫 台大教授賀德芬等將拜訪吳修齊、吳尊賢，盼台南幫緩議

- 撤資〉（1994年8月7日）。《自立晚報》，3版。
- 〈關心自立風格 學者發起連署 7月14日立委舉辦 自立報系改組座談會〉（1994年7月13日）。《台北自立報報》9，1版。
- 901新聞自主推動小組（1994年12月15日）。〈我們的行動〉，《901通訊》1，1版。
- 自立晚報報史編纂小組（1987）。《自立晚報四十年》。臺北市：自立晚報。
- 向秋玲（2005）。〈自立晚報產業工會的角色與功能之研究〉。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江碩涵（2008）。〈連寫二十年個人專欄：一九七五年自立晚報撰述委員／吳豐山〉，何榮幸策畫、臺大新聞研究所採訪，《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臺北市：時報。
- 何明修（2016）。《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台灣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新北市：左岸出版。
- 何榮幸（1996）。〈一個自主性新聞專業團體的誕生——記「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組織過程與實踐經驗〉，《新聞學研究》，52: 95-108。
-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記（1991）。《吳三連回憶錄》。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吳圳義（1996a）。〈吳三連與 1970年代中期以前的自立晚報〉，《國立政治大學學報》，72: 209-231。
- 吳圳義（1996b）。〈吳三連與 1970年代中期以後的自立晚報〉，《國立政治大學學報》，73: 253-278。
- 吳豐山（2015）。《人間逆旅：吳豐山回憶錄》。臺北市：遠流。
- 呂東熹（2010）。《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臺北市：玉山社。
- 呂東熹（2020）。〈吳三連與《自立晚報》之本土化轉折〉，《台灣史料研究》，55: 50-84。
- 李宗榮（2009）。〈制度變遷與市場脈絡：臺灣大型企業間董監事跨坐的歷史考察（1962-2003）〉，《台灣社會學》，17: 101-160。
- 李尚霖譯（2013）。《聲的資本主義——電話、RADIO、留聲機的社會史》。新北：群學出版。（原書 吉見俊哉[1995]. 《「聲」の資本主義——電話・ラジオ・蓄音機の社會史》。日本東京：講談社。）
- 李金銓（1987）。《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臺北市：圓神。
- 李梅君（2022）。〈拼裝公民科技：黑客、鄉民、與資料行動主義〉，《科技、醫療與社會》，35: 115-166。
- 林子儀（1993）。〈新聞自由的意義及其理論基礎〉，林子儀著《言論自由與新聞

- 自由》，頁 61-131。臺北市：月旦。
- 林富美（1999）。〈從自立早報停刊事件 談台灣報業發展的宿命〉，《目擊者》，10: 7-10。
- 林瑩秋（1994 年 9 月 4 日）。〈今年的記者節 有很多不一樣的聲音〉，《新新聞周刊》，頁 58。
- 林麗雲（2000）。〈台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1949-1999〉，《台灣產業研究》，3: 6-44。
- 林麗雲（2008a）。〈變遷與挑戰：解禁後的台灣報業〉，《新聞學研究》，95: 183-212。
- 林麗雲（2008b）。〈韓國的報業改革〉，《新聞學研究》，97: 257-282。
- 邱家宜（2020）。《戰後初期的台灣報人：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臺北市：玉山社。
- 洪貞玲（2006）。〈誰的媒體？誰的言論自由？——解嚴後近用媒介權的發展〉，《臺灣民主季刊》，3(4): 1-36。
- 洪廣冀（2018）。〈拼裝的科學革命——以美國第一回達爾文爭議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61: 159-235。
- 翁秀琪（1987 年 4 月 7 日）。〈傳播媒介內部的新聞自由——開放報禁後的另一個問題（上）〉，《自立晚報》，4 版。
- 翁秀琪（1987 年 4 月 8 日）。〈傳播媒介內部的新聞自由——開放報禁後的另一個問題（下）〉，《自立晚報》，4 版。
- 翁秀琪（1994 年 7 月 27 日）。〈搶救一份有尊嚴的報紙〉，《自立早報》，19 版。
- 徐佳士（1987）。〈請給新聞記者自主權〉，《東方雜誌》，復刊 20(10): 10-11。
- 徐璐（1994 年 8 月 29 日）。〈媒體大俗賣？從英、美企業併購新聞媒體的案例談起〉，《中時晚報》，19 版。
- 涂建豐（1994）。〈新聞專業與工會運動〉，《當代》，104: 144-147。
- 涂建豐（1995）。〈追求專業是為保障新聞自主與自律 期待「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方向〉，《當代》，108: 138-141。
- 涂建豐（1996a）。〈編輯室公約運動〉，《新聞學研究》，52: 35-48。
- 涂建豐（1996b）。〈「新聞自主的挑戰與回應」訪談〉，《新聞學研究》，52: 109-120。
- 袁孔琪撰寫，陳台林報告（1996 年 11 月 19 日），〈台灣媒體業工會發展簡介〉，臺北市：全國大眾傳播業工會聯合會。
- 涂鉅旻（2013 年 4 月 18 日）。〈協商 5 個月 《蘋果》簽了編輯室公約〉，《新頭殼 newtalk 新聞網》。取自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3-04-18/35621>
- 莊勝全（2021）。〈運動分裂下殖民地近代報刊的經營：以臺灣新民報社「同盟罷

- 業」與「冷語子事件」為例》，《臺灣史研究》，28(3): 169-210。
- 陳怡璇（2008）。〈歷史性大陸行之一：一九八七年自立晚報政經研究室主任／李永得〉，何榮幸策畫、臺大新聞研究所採訪《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頁 419-440。臺北市：時報。
- 陳國祥、祝萍（1987）。《台灣報業演進四十年》。臺北市：自立晚報。
- 陳菊（1994 年 7 月 25 日）。〈一個報業的興衰〉，《臺灣時報》，22 版。
- 陳翠蓮（2009）。〈台灣左翼的系譜（1920-1950）〉，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戰後台灣經濟與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
- 陳增芝（2012 年 8 月 19 日）。〈18 年後，自立工會又下 901 動員令！〉。【臉書網誌】。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陳增芝/18 年後自立工會又下 901 動員令/10151033143275003/](https://www.facebook.com/notes/陳增芝/18年後自立工會又下901動員令/10151033143275003/)
- 黃克先譯（2011）。《自由之夏》。新北市：群學出版。（原書 McAdam, D. [1988]. *Freedom summer*.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彭琳淞編（2021）。《自立容顏》。新竹市：自立三口組。
- 紫嘯鶴（1997）。〈高雄市新聞工作者組織發展源流〉，《目擊者》，2: 47-49。
- 馮建三（1994）。〈工會與新聞專業〉，《當代》，102: 35-36。
- 馮建三（1998）。〈另一個研究死角：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及其工會〉，《傳播研究簡訊》，15: 7-8。
- 馮建三（2014）。〈傳播拉丁美洲「社會主義」——委內瑞拉承先啟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7: 1-62。
- 黃順星（2008）。〈記者的重量：台灣政治新聞記者的想像與實作 1980-2005〉。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論文。
- 黃順星（2010）。〈新聞的場域分析：戰後台灣報業的變遷〉，《新聞學研究》，104: 113-160。
- 賀德芬（1994 年 7 月 29 日）。〈自立報，妳別走〉，《自立晚報》，3 版。
- 馮賢賢（1994 年 9 月 2 日）。〈媒體改造從公視起？〉，《自立晚報》，14 版。
- 楊秀菁（2002）。〈台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秀菁（2012）。〈新聞自由論述在台灣（1945-1987）〉。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楊秀菁（2014）。〈戒嚴時期傳媒「社會責任論」的引進與演變〉，《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2(2): 241-297。
- 楊憲宏（1994 年 9 月 5 日）。〈新聞黑暗勢力已經反撲〉，《自立早報》，19 版。
- 管婺媛（2008）。〈台灣 1980 年代《自立晚報》社會運動線記者的專業意理形成與實踐〉。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士敏 (2008a)。〈自立事件核心記者的生命故事〉。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士敏 (2008b)。〈解嚴後政治人權報導：一九九一年自立早報記者／陳銘城〉，何榮幸策畫、臺大新聞研究所採訪《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頁 495-517。臺北市：時報。
- 樂羽嘉 (2012)。〈新聞自由在中國的傳遞與實踐——以董顯光和馬星野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昌德 (2015)。〈自己的傳播權自己救：近十年媒體改革運動中的公民參與〉，《台灣人權學刊》，3(1): 121-133。
- 鄭涵文 (2014)。〈學生運動與媒體改革：傳播學生鬥陣史〉。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慧琳 (1994 年 9 月 17 日)。〈自立人手記——同是抗爭 異樣心情〉，《自立早報》，19 版。
- 鄭聲 (1994 年 9 月 26 日)。〈複雜多元的資訊站場——自立工會的「自立報報」評述〉，《自立早報》，5 版。
- 蕭阿勤 (2005)。〈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文化研究》，1: 97-120。
- 賴光臨 (1991)。〈檢驗 70 年代報業的發展〉，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編《中華民國新聞年鑑 80 年版》，頁 64-65。臺北市：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
- 賴秀如 (1994 年 9 月 2 日)。〈催生媒體專業組織 借重「香港經驗」〉，《中國時報》，11 版。
- 謝國興 (1999)。《台南幫：一個台灣本土企業集團的興起》。臺北市：遠流。
- 魏均 (2009)。〈公民社會、知識份子與國家關於台灣媒體改革運動的幾點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4: 317-330。
- 蘇正平 (1993)。〈新聞自由與自律——德國、東歐與日本經驗〉，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編《第二屆中華民國傑出新聞人員研究獎得獎人研習考察報告》，頁 49-89。臺北市：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
- 蘇正平 (1996)。〈新聞自主的理論與實踐〉，《新聞學研究》，52: 21-35。
- 蘇正平 (2012 年 9 月 3 日)。〈如何反壟斷？「新頭殼」就是我們的具體答覆〉，《新頭殼 newtalk 新聞網》，取自：<https://newtalk.tw/citizen/view/11095>
- Ress, Georg 著，林佳和摘譯，翁秀琪審定 (1994 年 9 月 21 日)。〈法國的新聞自由及報社企業的內部結構〉，《自立早報》，3 版。
-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UK: Verso.
- Briggs, A. & Burke P. (2010).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 From Gutenberg to the internet*. Cambridge, UK: Polity.

- Curran, J. (2002). Rival narratives of media history. In J. Curran, *Media and power* (pp. 3-54). London, UK: Routledge.
- DeLanda, M. (2016). *Assemblage theory*. Edinburgh, UK: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Deleuze, G. & Guattari, F. (1988). *A thousand plateaus*. London, UK: Athlone.
- Eisinger, P. (1973).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 11-28.
- Ember, M., Emery, E. & Roberts, N. (1997). *The press and Americ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the mass media*. London, UK: Pearson.
- Fox, E. (Ed.). (1988). *Media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
- Freedman, D. & Obar, J. (2016). Media reform: An overview. In D. Freedman, J. Obar, C. Martens, & R. McChesney (Eds.), *Strategies for media refor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3-18). New York, N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Gross, P. (2002). *Entangles evolutions: Media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Hsu, C. (2014).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s Media*. Leiden, NL: Brill.
- Latour, B. (2007).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u, H.-J. (2015). *Leverage of the weak: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artin-Rozumilowicz, B. (2002). Democratic change: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M. E. Price, B. Martin-Rozumilowicz, & S. G. Verhulst (Eds.), *Media Reform: democratizing the media, democratizing the state* (pp.9-26). London, UK: Routledge.
- McAdam, D. (1995). 'Initiator' and 'Spin-off' movements: Diffusion processes in protest Cycles. In M. Traugott (Ed.),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pp. 217-239),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chudson, M. (1981).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Snow, D. A., Rochford Jr. E. B., Worden S. K. & Benford R. 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64-481.
- Spivak, G. C. (1990).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London, UK: Routledge.
- Tilly, C. (198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Boston, MA: Addison-Wesley.
- Williams, H. R. (1995). Constructing the public good: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Social Problems*, 42, 124-144.

From “Labor Rights” to “Professionalism”: The Origin, Process, and Legacy of “The *Independent Post* Incident”

Chun-Ching Tu *

ABSTRACT

Taiwan’s media environment has undergone drastic transforma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With the deregulation of news institutions, large amounts of capital investments entered this market. As a result, a leading liberal news organization faced the challenge of ownership transfer, triggering a series of incidents that left various forms of impact in its path.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origin and process of “The *Independence Post* Incident” in 1994 as well as its legacy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a protest and collective action triggered by the transfer of media management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s post-war media history, media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movement literature. It discusses the topic through news reports, internal publications of trade unions, campaign literature, records and memoirs of activists, and supplementary interviews. The article tak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cident as the main axis, depicts the turning point of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incident, explores the social context, and dwells on its significance. The particularity of this movement is its goal of saving the integrity of a newspaper and using the newspaper as a

* Chun-Ching Tu is a master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sects wit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economic sociology, and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He is concerned with how civil society responds to institutional change. E-mail: chunchingtu.tw@gmail.com.

tool for expressing protesters' demands. The journalis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is movement have provided a large number of written texts, to which this article is indebted.

The incident started when the newspaper boss owed employees' wages. Words came out that the newspaper may change owners due to mismanagement and a resulting financial crisis. It was later reported that the new operator might be someone who had a deep relationship with the ruling party and a construction consortium. Such developments caused anxiety among the newspaper's employees.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many "autonomous trade unions," in contrast with trade unions attached to the government, were established, and the *Independent Post* trade union was one of them. Campaigns led by the trade union, fearful of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newspaper's change of ownership, focused on labor rights of employees. They appealed for the protection of employees' pensions and seniority.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became aware of the possible changes in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caused by the replacement of the boss, including issues relating to editorial independence.

Starting from the 1970s, The *Independent Post* continued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spreading democratic messages. The changes that the newspaper could have faced aroused the concern of the public. Many people in cultural, social movement, and academic circles launched the "Save The *Independent Post*" campaign. Following it, the incident went from a labor dispute within the company to a public issue in the media. The reporters requested the new boss to sign the "Editorial Board Convention" to ensure independence of the news, and they also asked for full retirement and re-employment benefits. However, the new owner did not agree. The employees of the newspaper later launched a campaign to vote for the editor-in-chief to fight against the new owner. Journalistic autonomy and professionalism were

central demands at this stage. The discourse was assembled by protesters from disparate sources. One of the sources re-narrated the history of the *Independent Post*, constructing its tradition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with strategic essentialism. Another source used foreign theories on Internal Press Freedom (Innere Pressefreiheit) and Editorial Board Conventions to justify the claim emphasizing that Taiwan should also create the conditions to achieve them.

With the protests of the activists and attention from society, more actions began to emerge. Journalists from different news organizations initiated the “901 Walk for Media Independence” and took to the streets during a typhoon. In addition to internal press freedom and Editorial Board Convention, they also 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ofessional media organization. After the demonstration, some participants came together to form the Association of Taiwan Journalist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organization, there was a debate about whether to act as a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or to follow the trade union line. This divergence showed the diverse concerns of participants in the movement. In the end, the Association’s positioning was mainly based on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With the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the *Independent Post*, the internal disputes within the newspaper gradually came to an end, but most demands of the activists were not met. However, outside the company the *Independent Post* incident has left considerable legacies. 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 it contribu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Taiwan Journalist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 Editorial Board Convention was adopted by many media organizations, and journalists also used them to safeguard press freedom, although the practices vary among different news outlets. At the symbolic level, the *Independent Post* incident becam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in subsequent media reform movements.

The literature often regards media change as an outcom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llective action triggered by media ownership change, emphasizes the autonomy and agency of the media, and discusses the role of the media as both forced and forcing. It deconstructs the view of “media as a whole” and analyzes its inner dynamics. Different actors in the media field, from newspaper owners, editors, and reporters to unions, have actively responded to public opinions. Journalists have also inherited the context of the union movement, assembling the concept of Journalistic Autonomy with complex sources. The incident has left its mark in Taiwan’s post-war media history. At a time when the media environment continues to encounter many new challenges and unprofessional interventions, re-examining this incident is of relevance when thinking about new directions for media reform.

Keywords: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media history, media reform, social movement, The *Independent Post* Incident, union

• 新聞學研究 • 第一五七期 2023 年 10 月